

戰略戰術思想的延續與轉變： 1939年國軍的四次反攻^{*}

蘇聖雄^{**}

摘 要

在國軍的歷史敘述中，整場中日戰爭皆已妥善規劃，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實行節節抵抗的持久戰；武漢會戰後的第二期抗戰中，國軍轉守為攻，以奪取最後勝利。與國軍自身敘述不同，部分論者雖肯定國軍的貢獻，但批評其戰略戰術消極被動，缺乏攻擊意志，且指出蔣中正更期待西方國家幫助他打贏戰爭，同時維持大量部隊防堵毛澤東的共軍。本文藉由1939年國軍的四次反攻，重新探討上述分歧的論述，考究國軍對攻勢的理解。四次反攻相關研究並不多見，雖然整體鋪陳中日戰爭史實的著作多少會提到，卻多未展開討論。本文首先重建四次反攻的史實；其次從政略角度探討國軍為何發動四次反攻，分析所謂「速勝論」的是非，並探討國軍情報對戰略的影響；最後從軍事思想角度解釋四次反攻的根本原因。本文試圖說明，國軍發動四次反攻，有政略考量及對戰局樂觀欲自力勝敵的因素，但最關鍵的還是軍事思想的深厚背景。從軍事思想的脈絡來看，即便沒有短期政略考量，國軍也會發動反攻，這是1939年四次反攻的根本原因。論者批評國軍不採取攻勢，其實自開戰以來，國軍一直採取攻勢防禦，到1939年達到高峰，只是中日戰力差距太大，難以落實。1939年的反攻，不是武漢會戰後的新戰法，而是先前戰略戰術的延續，此期間也是國軍軍事思想的關鍵轉變時期。

關鍵詞：中日戰爭、冬季攻勢、蔣中正、戰爭論、軍事思想

* 收稿日期：2023年3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8月11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 言

1938 年 11 月武漢會戰結束後，中日戰爭已經打了一年多，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從東南沿海撤到平漢鐵路線，戰略有比較大的調整。依據國民革命軍（以下簡稱國軍）自己的說法，武漢會戰以前是第一期作戰，為守勢時期，力保要地，消耗疲憊敵人，粉碎敵軍速戰速決的企圖。此後為第二期作戰，屬持久戰時期，國軍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擊及反擊消耗敵人，策應敵後游擊戰，化敵後方為前方，迫敵困守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質之剝奪，以打擊敵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集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反攻。此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國軍與盟軍並肩作戰，除不斷實施局部攻擊，牽制敵陸軍主力，並派軍入緬，協助盟軍作戰。一直到戰爭最後一年始為第三期作戰，屬反攻時期，國軍全力配合盟軍行動，從西南發動反攻，收復失地，迫日本宣布投降，此期為全面受降所取代。¹

在國軍的歷史敘述之中，整場戰爭皆已規劃妥善，以空間換取時間，實行節節抵抗之持久戰，「在戰略上雖不能全無錯誤，但一般說來，確已達成任務」。採取攻勢是抗戰的重要手段，尤其第二期抗戰將要「轉守為攻」。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期許他的軍隊「具旺盛之企圖心」，「利用機動，尋求敵之弱點而攻擊之」，「發揮攻擊精神」。³

¹ 何應欽編著，《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13-14。

² 何應欽編著，《八年抗戰》，頁 100、107。

³ 蔣中正，〈南嶽軍事會議手訂各項要則及第一期抗戰之總評〉（1938 年 11 月 28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下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以下簡稱《蔣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卷 15，頁 564-565。國軍其他論著，大抵持相似看法，參見蘇聖雄，〈從軍方到學界：抗戰軍事史研究在臺灣〉，《抗日戰爭研究》，2020 年第 1 期，頁 141-157。近似或延續國軍說法的研究，舉要如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收入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1937 年至 1945 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50-101；劉鳳翰，〈論國軍與抗戰〉，《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周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 131-190；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1-78；傅應川，〈抗日戰爭的戰略思想及其發展〉，收入黃炳麟、王建朗主編，《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2023），頁 99-112。

與國軍自身的論述不同，部分論者雖肯定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貢獻，但在戰略戰術上，批評國民黨軍缺乏進攻意識，消極防禦：國民黨軍僅僅以「深溝、高壘和厚壁」為依託，進行單純的陣地防禦戰而忽略外線作戰，是消極被動的抗戰方針，這一方針具體表現為「消極被動防守，不做積極攻勢作戰」。⁴又或指出，國民黨最高軍事當局的主要決策者和多數高級將領，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登戰役所形成的防禦理論，囿於已成定勢的軍事思想，對持久消耗戰略的理解和實施，都是企圖以戰役上陣地防禦的持久消耗戰，來達到戰略上的持久消耗戰；雖然蔣中正不是沒有訓示下屬主動攻擊，但「總的戰略思想是消極防禦」，「絕大多數高級將領都了解蔣介石等保守實力、準備將來的想法」。⁵部分西方論者亦曾有所批判。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指出，蔣中正不主張主動攻擊，認為應該「不戰而屈人之兵」，他累積有限的軍事實力對內，對外則希望美國替他打贏日本。⁶多恩（Frank Dorn）認為，國民政府多數高階將領保全實力以維持政治上的勢力，不冒著軍隊覆滅的危險主動攻擊，他們沒有攻擊意志，傾向防禦而非進攻，蔣中正維持相當大的部隊去防堵毛澤東的共軍。⁷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曾指出，武漢和廣州失陷以後，戰爭陷入停滯，蔣中正認為西方國家終究會參戰，因此避免大規模會戰，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以後，判斷盟軍將會戰勝日本，國軍不用再繼續犧牲。⁸

⁴ 榮維木等著，《戰時軍事》，收入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卷2，頁36。相似看法之論著，舉要如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53-54；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296；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上冊，頁278。

⁵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修訂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下冊，頁1223-1225。

⁶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pp. 9-10, 366.

⁷ Frank Dorn,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4), pp. 100-101, 113, 120, 129-130, 153.

⁸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and Lyman P.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4, 136.

以上分歧的論述，究應如何理解？事實上，武漢會戰結束沒多久，整個 1939 年國軍主動發動四次攻勢，而年底的冬季攻勢，規模尤大。透過四次攻勢，得以考察武漢會戰後的國軍戰略——蔣中正對這場戰事如何設想？戰略戰術為何？四次反攻目的為何？實際作用與影響為何？批評者指出蔣採取消極被動的防禦戰，又或認為他保存實力，坐待世界大戰爆發憑盟軍之力獲取勝利，若果真如此，蔣何以數度主動發起攻勢？本文不欲陷入國軍是否認真抗戰的是非題，而欲申論國軍主導抗戰全局的戰略戰術究竟為何。

有關 1939 年國軍四次反攻的研究並不多見，整體鋪陳中日戰爭史實的著作雖然多少會提到，但多未展開。上述多恩的著作以一定篇幅敘述冬季攻勢史實，但對此一攻勢評價極低，認為整個冬季攻勢不過是蔣中正政府的宣傳，發動這場攻勢是為了向美國要求援助以維持自己政權，整場攻勢反而造成軍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⁹齊錫生對冬季攻勢的看法與多恩相反，認為冬季攻勢的發動證明國軍沒有喪失鬥志，也沒有企圖以拖延戰術挨到美國參戰，實際上國軍高估己身作戰能力，認為日本蕞爾小國終必無法應付長期作戰所需兵源及財源；要到冬季攻勢失敗以後，國軍才深深體會到自己的弱點，心態漸趨保守。¹⁰

本文在先前研究基礎之上，首先重建四次反攻的史實。其次探討國軍為何發動四次攻勢，從政略、速勝論、情報一一進行檢視。最後提出，國軍四次反

⁹ Frank Dorn,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p. 304-322.

¹⁰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收入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學術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 9-11。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 56-63; 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 1937-1945〉（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3），頁 179-202。方德萬、郭岱君延續齊錫生的觀點，參見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239-246;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二）：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合流 1938.11-1945.08〉（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2），頁 104-121。其他冬季攻勢相關專論，如方山，〈國民黨戰場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勢簡論〉，《軍事歷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頁 145-153、166；雒春普，〈閻錫山與第二戰區的「冬季攻勢」〉，《抗日戰爭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89-97；李作民，〈評 1939 年冬季攻勢兼論國民黨抗日政策的轉折〉，《民國檔案》，1995 年第 1 期，頁 93-99。

攻緣由，須從軍事思想切入，方能充分理解此一舉措。本文試圖說明，四次反攻是國軍抗戰戰略戰術的延續，也是相關軍事思想的關鍵轉變時期。

二、四次反攻的始末

武漢會戰以後，國軍規劃一面作戰，一面更番抽調整訓。所謂整訓，包含改良編制、充實裝備、統一人事經理，加緊訓練教育。全國軍隊應於一年內分三期整訓，全部整訓完成即開始大規模反攻，而如實際情況有利，亦可隨時發動反攻。¹¹

表 1 中日陸軍戰力比較表

全軍兵力比較							
國軍		步兵共264個師			總兵力約2,685,000人		
日軍		步兵共41個師團			總兵力約1,249,000人		
師編裝比較							
	人員	步騎槍	擲彈筒	馬匹	輕機槍	重機槍	火炮
國軍	9,839	2,500	143	1,821	172	54	34
日軍	25,200	7,686	288	8,150	440	100	92
比較	1:2.56	1:3	1:2	1:4.4	1:2.5	1:1.8	1:2.7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第四篇第十九章第一節插表第九、頁11；陳誠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南京：國防部參謀本部，1946），抗戰各時期敵我使用兵力及傷亡人數一覽表，原無頁數；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付表5，「陸海軍兵力的變遷」，頁490。

說明：

1. 全軍兵力比較係1939年數據。
2. 師編裝係比較日軍常備師團與國軍1938年師。
3. 日軍重點師團另配屬戰車1大（中）隊，高射砲2、3中隊（4門至6門），野戰重砲（十五榴24門或獨立山砲36門），獨立重砲（十加8門至16門）及獨立工兵1聯隊。國軍編制數字，缺額多，步騎槍及馬匹亦未按編制充實。

¹¹ 何應欽編，《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48），上冊，頁182、186、262。

因調動費時，整訓進度落後。1938 年底至 1939 年 4 月底原定完成第一期整訓，延至 7 月底始完成，共計 26 個軍及 27 個師。之後的整訓遞延，1939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 月底止完成第二期 40 個軍整訓。1939 年 12 月底開始第三期整訓，至 1940 年 8 月底始完成，分軍委會直轄整訓、戰區直轄整訓，前者計 5 個軍 15 個師，後者計 16 個軍 42 個師。¹²三期整訓尚未完成，中日兩軍戰力仍有相當差距（表 1），國軍仍於 1939 年陸續發動四月攻勢（春季攻勢）、七月攻勢（夏季攻勢）、九月攻勢（秋季攻勢），年底復發動更大規模的冬季攻勢。¹³

（一）四月攻勢（春季攻勢）

第一期整訓開始未久，蔣中正於 1939 年 1 月頒發〈國軍第二期作戰指導方案〉，作戰方針為增強被敵佔領地區之力量，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主力配置於浙贛、湘贛、湘西、粵漢、平漢、隴海、豫西、鄂西各要線，極力保持現在態勢，儘量牽制敵人，獲取時間之餘裕，俟新戰力培養完成，再行策動大規模攻勢。¹⁴此一計畫顯取守勢，待整訓完成再發動反攻。

一個月後，蔣頒發〈國軍攻勢移轉部署方案〉，開始部署攻勢。該方案之方針，係為牽制消耗日軍，援助國軍游擊部隊，打破日軍扼守要點，抽轉兵力，建立華北軍事根據地之企圖。攻擊開始時機分兩個梯次，第一、第二、第五、第八、第十、魯蘇、冀察各戰區為 3 月上旬，第二、第四、第九各戰區為 4 月上旬。¹⁵此即四月攻勢作戰計畫（表 2）。

¹² 何應欽編，《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冊，頁 231、306；下冊，頁 367。

¹³ 何應欽編，《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冊，頁 248、319。

¹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下略），《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上冊，頁 66-67。

¹⁵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67-69。

表 2 四月攻勢各戰區作戰任務表

戰區	轄區	司令長官	作戰任務
第一戰區	豫境及皖之一部	衛立煌	遮斷鐵道，策應冀中國軍之作戰。
第二戰區	晉及陝之一部	閻錫山	一部向晉北攻擊遮斷鐵道，阻止其轉用。以晉南部隊向臨汾以南同蒲路之敵攻擊，與晉西部隊相策應，掃蕩晉南三角地帶之敵。
第三戰區	蘇南、皖南及浙閩兩省	顧祝同	各以有力之一部分向杭、嘉、京、蘇各地區之敵襲擊，另以一部吸引敵人並妨礙其水陸交通。
第四戰區	兩廣	張發奎	於西江方面採決戰防禦，拒敵西犯，以有力一部向廣州方面攻擊，其他各地區部隊儘量牽制吸引消耗敵人。
第五戰區	皖西、鄂北、豫南	李宗仁	主力求平漢鐵路南段之敵而殲滅之，並澈底破壞敵交通線。
第八戰區	甘寧青綏	朱紹良	以一部由五臨方面向東挺進，策應第二戰區之作戰，相機攻略包頭。
第九戰區	贛北、鄂南及湘省	薛岳（代）	以有力部隊相機佔領沿江據點，一部分向九江方面及通城、咸寧、崇陽間地區之敵攻擊，斷敵水路補給線，牽制其兵力之轉用。
第十戰區	陝西方面	蔣鼎文	以一部渡河入晉，歸第二戰區指揮，會合晉西各軍，掃蕩臨汾南北之敵。
魯蘇戰區	蘇北、魯省	于學忠	主力以魯南山地為根據，向膠濟及濟徐間鐵道襲擊，遮斷敵之交通，並採避實擊虛粉碎敵人掃蕩企圖。
冀察戰區	冀察	鹿鍾麟	破壞平漢鐵路，策應冀中國軍之作戰，並粉碎敵人掃蕩之企圖。

資料來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67-6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358-367。

國軍四月攻勢發動以前，日軍先於3月17日向南昌周圍進攻，南昌會戰爆發。軍委會先前已偵悉敵軍攻略南昌之企圖，判斷日軍主力在江西北部，將沿南潯鐵路由九江（簡稱潯，位南昌北方）向南進攻，即令第九戰區以主力固守南昌北正面，以有力一部自南昌西北武寧方面向江西北部瑞昌、德安進攻，其目的是攻擊敵軍側背，先發制人，預定3月10日前完成攻擊準備，15日發

起攻擊。然而，第九戰區補充遲緩，整訓未畢，未能如期發動攻勢。日軍按計畫發動進攻，不僅從南昌北正面沿鐵路南下強攻，同時繞道南昌西邊的安義、奉新再向南昌西南側攻擊。國軍南昌外圍陣地遭到突破，南昌城於 3 月 27 日失陷。¹⁶

南昌失陷後，蔣中正決計反攻南昌，同時按預定計畫，發動四月攻勢。4 月 16 日，策定反攻南昌計畫。¹⁷攻擊開始後，雙方於南昌東南、西南地區激烈戰鬥。蔣中正關心戰局，電令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督飭前線將領積極作戰，「限五月五日以前攻下南昌，如不能攻下，該總司令等及所屬軍、師、旅長均應受處罰」。¹⁸5 月 5 日時間到後，南昌仍未攻下，官兵多有傷亡，南昌攻擊終止。¹⁹

南昌反攻的同時，其他戰區發動四月攻勢。²⁰第五戰區令其所屬各部隊向隨縣以東及安陸、應城、天門等地區出擊，又令豫鄂皖邊區的部隊向信陽、廣水、花園日軍襲擊，這些部隊包括相對精銳的中央軍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部。²¹日軍偵得國軍動向，情報顯示，國軍在全正面以相當數量的部隊出擊，蔣中正並於 4 月 15 日再度督促「總反攻」。²²直接面對衝擊的日軍部隊，是以武漢為核心、岡村寧次統率的第十一軍，該軍係日軍在中國最重要的野戰部

¹⁶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頁 350-362。

¹⁷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85。

¹⁸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二）》，頁 111。

¹⁹ 「薛岳電蔣中正」（1939 年 5 月 11 日），〈八年血債（二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以下簡稱《蔣檔》，並略藏地），典藏號 002-090200-00052-066；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二）》，頁 127、141。

²⁰ 〈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 年 4 月），《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以下簡稱《戰史會檔》，並略藏地），檔號七八七-13295。

²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隨棗會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4。

²²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頁 196；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362。日軍偵查屬實，蔣於該日通電各戰區澈底檢討過去作戰，要求以勇敢精神爭取勝利，不惜代價予敵重大打擊。〈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 年 4 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3295。

隊。第十一軍隨即策定反擊國軍四月攻勢的作戰計畫，作戰目標為打擊棗陽附近的國軍部隊。²³4月下旬，國軍偵知日軍約3個師團向鄂北集中，有大舉進攻國軍模樣，遂停止四月攻勢，準備日軍來攻。²⁴

（二）七月攻勢（夏季攻勢）

日軍第十一軍於5月5日向鄂北國軍第五戰區進攻，是為隨棗會戰（作戰主要在隨縣、棗陽間），日軍稱襄東會戰（襄東指襄河以東；漢水過襄陽下游一段別稱襄河）。日軍作戰目標，在捕捉、殲滅國軍部隊，挫折國軍續戰意志，尤以打擊湯恩伯部為主，不重奪取城市，作戰目的達成即回退。5月11日，日軍第三師團與湯部在合河對戰，戰況激烈，日軍認為擊潰湯部目標已成，陸續反轉撤回，會戰迅速結束。²⁵

隨棗會戰的發動與結果，國軍認知與日軍相反，以為日軍受到春季攻勢之打擊，損失很重，不能安枕，故而發動進攻，國軍於是役達成消耗戰之目的。²⁶蔣中正自記：「敵軍進攻鄂北部隊，完全向平漢路沿線撤退而且放棄，隨棗亦不敢守，此為敵軍無力前進，轉攻為守，再顯明之弱點，吾計售矣」；²⁷「五月間戰事。敵軍企圖消滅我湯恩伯軍而未得，敵不僅不敢進佔襄樊，而且退出隨棗，是敵軍不敢西進之弱點完全暴露。此後除長沙、株州以外，軍事上皆無顧慮，而且我軍更可立於優勢主動地位矣。」²⁸

蔣中正繼續規劃反攻，蘇聯軍事顧問參與計畫。6月16日，蘇聯軍事總顧問切列帕諾夫（Aleksandr Ivanovich Cherepanov）向蔣中正闡述反攻的看法，

²³ 〈襄東會戰〉，《第11軍作戰經過の概要並に所見・昭和13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檔號C11112058000。

²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隨棗會戰（二）》，頁4。

²⁵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363-374；苟吉堂編，《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出版地不詳：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1947），頁119-135。

²⁶ 「蔣中正電薛岳羅卓英」（1939年2月4日），〈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一階段作戰經過概述〉，《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12-001。

²⁷ 〈蔣中正日記〉，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下略），1939年5月27日「上星期反省錄」。

²⁸ 〈蔣中正日記〉，1939年5月「本月反省錄」。

重點提出兩點，一為中國軍隊能夠對長江谷地的日軍實施毀滅性的突擊，二為必須撤銷不執行軍委會命令和不同意進攻計畫將軍的所有職務。蔣中正同意他的提案，答應查辦玩忽職守的將軍。²⁹6月20日，蘇聯軍事顧問在軍委會軍事會議上報告總顧問擬訂的〈關於中國軍隊在長江谷地發動總攻的建議〉。計畫建議由第五、第九戰區擔任主要角色，攻佔武漢，將長江以北日軍逐至霍山、宿松一線，長江南岸日軍逐至鄱陽湖以東，也就是恢復武漢會戰前的態勢。其他軍事要員陸續發表看法。蔣最後決定，以蘇聯軍事總顧問提出的進攻計畫為基礎發出訓令，並要求各司令長官選擇進攻目標時，避開各據點，7月中旬完成進攻準備。³⁰此即6月22日頒布的〈二十八年夏季作戰計畫〉，計畫方針以確保山西、堅持冀察魯蘇游擊，使爾後攻勢作戰有利為目的，除直接增強冀察、魯蘇，尤其第二戰區之兵力外，各戰區以約三分之一兵力（除整訓部隊）施行局部攻勢，牽制消耗敵人，攻勢開始時間預定在7月中旬（表3）。³¹

命令頒布以後，蘇聯軍事總顧問切列帕諾夫以為，夏季攻勢作戰計畫內容較短且沒有指定明確期限，擔心各戰區司令長官執行訓令時將僅對日軍實行「刺針式進攻」，建議給予具體任務說明。蔣中正接受計畫的修訂，確定所有部隊轉入進攻日期為7月27日。各蘇聯顧問隨即赴各戰區協助作戰準備。³²第三、第四、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以沒有做好準備，請求推遲預訂進攻日期，軍委會同意將進攻推遲到8月15日。³³

各戰區依軍委會命令，策定自身作戰計畫，陸續展開先期攻擊行動。³⁴這就是所謂七月攻勢（夏季攻勢）。整個過程，仍僅有全面發動攻勢前的各戰區

²⁹ 卡利亞金著，賴銘傳譯，《沿著陌生的道路：一位蘇聯駐中國軍事顧問的筆記（1938-1939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頁329。卡利亞金（Aleksandr Iakovlevich Kaliagin）係蘇聯工兵軍官，1938年赴中國擔任軍事顧問，1939年底返蘇。以下徵引該書，省略副標題。

³⁰ 卡利亞金著，賴銘傳譯，《沿著陌生的道路》，頁329-334。

³¹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69-71。

³² 卡利亞金著，賴銘傳譯，《沿著陌生的道路》，頁335。

³³ 卡利亞金著，賴銘傳譯，《沿著陌生的道路》，頁354。

³⁴ 〈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年7月）、〈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年8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3304、七八七-13305。

小規模襲擊，整體攻擊力度不強。事實上，作戰計畫本就規劃「攻擊目標之選定，務避據點之爭奪」，「敵若固守不出，則進出戰略上重要及攻擊容易地區，多方擾亂敵後，方使敵疲於奔命，各不相顧」，³⁵非攻堅而以擾亂為主。日軍因此僅察知國軍實施強力游擊戰，並未感到一波強勁的攻勢。³⁶

表3 夏季攻勢各戰區作戰任務表

戰區	轄區	司令長官	作戰任務
第一戰區	豫境及皖之一部	衛立煌	一部向信陽、長台關之敵襲擊，精銳一部進出開封以東隴海路南北兩側地區，積極破壞交通。另以一部遮斷汴新段（開封、新鄉間）之連絡。
第二戰區	晉及陝之一部	閻錫山	自我確保。
第三戰區	蘇南、皖南及浙閩兩省	顧祝同	妨害敵長江航運，積極破壞京滬杭交通，增加淞滬地區游擊兵力，積極擾襲敵人。
第四戰區	兩廣	張發奎	以一部由粵漢南段，主力由增城、從化方面進出，向敵交通線後方繞攻，消耗敵人。
第五戰區	皖西、鄂北、豫南	李宗仁	恢復隨棗之役戰前態勢，威脅武漢。
第八戰區	甘寧青綏	朱紹良	與第二戰區聯繫，為必要之策應。
第九戰區	贛北、鄂南及湘省	薛岳（代）	以有力一部分向南潯線及咸寧、岳陽間，襲擊消耗敵人。
第十戰區	陝西方面	蔣鼎文	抽出精銳二軍開晉東南，掃蕩三角地帶之敵。
魯蘇戰區	蘇北、魯省	于學忠	以持久戰之要領，努力保持魯南游擊根據地，疲弊敵人，並相機破壞津浦、膠濟、隴海各路，妨害敵之運輸。
冀察戰區	冀察	鹿鍾麟	積極破壞津浦路滄縣至德州段、平漢路定縣至邯鄲段鐵道，阻絕敵之運輸。

資料來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69-71。

³⁵ 《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70-71。

³⁶ 〈第11軍作戰經過の概要並に所見〉，《第11軍軍狀報告・昭和13年7月中～15年3月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C11112072000。

（三）九月攻勢（秋季攻勢）

由於各戰區司令長官始終無法在規定期限內做好準備，8 月初的時候，反攻又推遲至 9 月 15 日。九月攻勢計畫與七月攻勢相差不遠，都是擾亂敵軍為主。軍委會軍令部第一廳（作戰廳）廳長劉斐向蘇聯顧問透露，九月攻勢是若干局部性擾亂行動，而且不準備使用戰車、砲兵和航空兵。³⁷

8 月 26 日，蔣中正密電各戰區，「九月中旬，必須各戰區共同出擊，不得玩忽敷衍，坐失時機」。時歐洲局勢詭譎，蔣的密電同時表示「七月攻勢未收預期戰果，深為遺憾。今國際情勢激變有利，為加敵以大打擊，促成更有利之發展，各戰區應於九月中旬，以戰區現有兵力，繼續實施攻勢努力」。電文接著陳述各戰區任務。此即九月攻勢計畫，加入了砲兵的作戰（表 4）。³⁸

未待國軍發動九月攻勢，日軍受到國軍先前夏季攻勢的不斷襲擾，決定再度出擊，目標擊破贛湘附近的國軍中央軍，挫折中國抗戰意志。這便是第一次長沙會戰，日軍稱贛湘作戰。³⁹9 月中旬開始，湘北岳州一線第十一軍各部先後發動攻擊，沿粵漢鐵路沿線南下，9 月下旬抵達長沙北側地區。日軍判斷已給國軍重大打擊，作戰目的達到，全線開始撤退，10 月 16 日歸還原駐地。⁴⁰與日軍認知不同，國軍認為第一次長沙會戰是一次重大勝利，藉誘敵殲滅戰法，不呆守陣地而以反包圍破敵。⁴¹

即便第一次長沙會戰正在進行，國軍並未終止九月攻勢，蔣中正電令各戰區「仍依既定計畫，努力進攻，消耗敵人，打破敵之企圖」。⁴²然而，或因軍委會精力集中在贛湘方面的第一次長沙會戰，九月攻勢並未真正展開，僅有各

³⁷ 卡利亞金著，賴銘傳譯，《沿著陌生的道路》，頁 354。

³⁸ 〈「蔣介石 8 月 26 日付 9 月攻勢に関する視察」送付の件〉，《陸支受大日記（密）第 59 号・昭和 14 年自 9 月 13 日至 9 月 18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04121361700；《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71。

³⁹ 〈贛湘會戰〉，《第 11 軍作戰經過の概要並に所見・昭和 13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1112058100。

⁴⁰ 井本熊男，《支那事变作戰日誌》（東京：芙蓉書房，1998），頁 34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一次長沙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1-2、10-23。

⁴¹ 趙曾儔等編，《抗戰紀實》（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冊 2，頁 114。

⁴² 〈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 年 9 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3306。

戰區的一些游擊戰。⁴³如第二戰區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部的一個連，在東郭鎮（安邑東南）預伏一排，襲擊一批行軍中的 30 餘人日軍。日軍隨即散開以機槍還擊，戰約 1 小時，國軍該連另一排聞訊趕至，向日軍猛射，日軍退回段村，國軍亦撤回。⁴⁴又如第三戰區第六十三師的一個營偕同工兵在新豐車站西北 5 公里處炸毀日軍兵車一列，各據點日軍隨即四出攻擊，國軍以任務達成而撤回。⁴⁵

表 4 九月攻勢各戰區作戰任務表

戰區	轄區	司令長官	作戰任務
第一戰區	豫境及皖之一部	衛立煌	對歸德斷行攻襲。
第二戰區	晉及陝之一部	閻錫山	對長治及晉白公路之敵如期肅清。
第三戰區	蘇南、皖南及浙閩兩省	顧祝同	破壞京滬杭鐵道、公路，同時以游動炮兵乘隙進出江岸要點，射擊敵艦一二次後，即變換陣地。
第四戰區	兩廣	張發奎	仍繼續現有攻勢，另以精銳一師以上之兵力，配合多量團隊，襲攻廣九路深圳及東莞、虎門之敵，其重點指向深圳。
第五戰區	皖西、鄂北、豫南	李宗仁	對安慶、黃岡斷行攻襲，而對鍾祥更應積極攻克，集中砲兵協同進攻。
第八戰區	甘寧青綏	朱紹良	無具體任務。
第九戰區	贛北、鄂南及湘省	薛岳（代）	以武岳路與南潯路為目標，加強攻擊力量，不斷攻襲。
第十戰區	陝西方面	蔣鼎文	無具體任務。
魯蘇戰區	蘇北、魯省	于學忠	截斷膠濟與津浦兩路，不使通車。
冀察戰區	冀察	鹿鍾麟	截斷平津鐵路，不使通車。

資料來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71。

⁴³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各地游擊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135、177-192。

⁴⁴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作戰日記〉（1939 年 9 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3397。

⁴⁵ 日軍後來報復捕捉新四軍士兵一名，剝皮懸電線杆上示眾。〈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陣中日記〉（1939 年 9 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3691。日軍對國軍九月攻勢的觀察，可參見〈9 月攻勢の觀察〉，《支那事變教訓・昭和 13 年 10 月～14 年 9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1110697400。

蔣中正對九月攻勢不甚滿意，電各戰區：「九月攻勢未收預期效果，顯見未切實遵照八月有〔26 日〕午電令後，各該部所呈報核定之部署實施」，他要求各戰區繼續破壞日軍交通。⁴⁶日軍感到四月攻勢以來，國軍不斷聲言的反攻規模逐次縮小，判斷是國軍官兵素質低下，以及武器彈藥缺乏所致。⁴⁷出乎日軍意料之外，是年冬季，國軍發動八年抗戰期間範圍最大的反攻作戰。

（四）冬季攻勢

1939 年國軍的前三次反攻，受到部隊尚未整訓完成的限制，無法發動全面攻勢。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坦承，「老實說我們為什麼沒有方法轉移攻勢，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指揮訓練均趕不上敵人」。⁴⁸年底，三期整訓仍未完竣，但兩期已成，蔣中正決定發動全面反攻。⁴⁹

此一反攻準備較久，年中蔣已開始規劃「秋冬季反攻之準備」、「冬季反攻之時與地的研究」。⁵⁰10 月間規劃「冬季攻勢準備完成」、⁵¹預定「冬季攻勢方案」。⁵²10 月底、11 月初蔣召開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與各主官與將領研究政局與外交，並且「決定冬季攻勢部署」。⁵³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其中，南嶽軍事會議上總顧問福爾根（Kuzma Maksimovich Kachanov，接替切列帕諾夫）提出冬季作戰計畫獲接受。⁵⁴11 月 16 日蔣「核定冬季攻勢方案」，19 日再修正冬季攻勢命令，隨即核發。⁵⁵

⁴⁶ 〈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陣中日記〉（1939 年 9 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3698。

⁴⁷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戰〈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57），頁 100。

⁴⁸ 〈張發奎日記〉，哥倫比亞大學珍本與手稿圖書館藏（下略），1939 年 7 月 15 日「上星期反省錄」。

⁴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頁 1-2。

⁵⁰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6 月「秋季課程表」；7 月 15 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⁵¹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9 月「本月反省錄」。蔣中正的反省錄，一般是下個月記上個月，本文故推論這段日記為 10 月所記。

⁵²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0 月 23 日。

⁵³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0 月 28 日「上星期反省錄」；11 月 4 日「上星期反省錄」。

⁵⁴ 周黎揚，〈抗日戰爭期間蘇聯軍事顧問〉，《百年潮》，2005 年第 8 期，頁 29。周黎揚係蘇聯軍事顧問之翻譯。

⁵⁵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1 月 16、19 日。

冬季攻勢指導方針，在切斷長江，斷絕日軍武漢兵團（岡村寧次的第十一軍）之後方，同時攻擊武漢日軍突出部之平漢鐵路南段，使頭尾不能相應，然後包圍施以打擊；其他方面的國軍作為策應，將同時發動進攻。⁵⁶正式發布的冬季攻勢命令中，作戰方針明示作戰目的、主攻、助攻與攻勢開始日期。作戰目的為消耗日軍，使國軍爾後作戰有利。主攻、助攻則依戰區區分。主攻為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戰區，軍委會直轄整訓部隊加入作戰；助攻為其餘第一、第四、第八及魯蘇、冀察各戰區，向當面敵人實施攻擊，策應主攻方面之作戰，牽制敵之兵力，俾主攻方面奏功容易（表 5）。⁵⁷

原計畫攻勢開始日期，主攻的第五、第九戰區限於 11 月 26 日以前實施，助攻方面概限 11 月底，其餘主攻概限 12 月上旬分別實施。⁵⁸復經地方軍事長官商討，主攻的第五、第九戰區改於 12 月 8 日同時發動，又為充分準備延到 12 月 12 日。⁵⁹合計攻勢使用兵力 132 個師，148 萬人，攻勢兵力佔國軍總兵力逾 46%。⁶⁰

命令發出後，蔣不斷對戰區司令長官提醒作戰注意事項。⁶¹12 月 7 日，通電各戰區說明冬季攻勢之意義：「此次冬季攻勢為我抗戰轉敗為勝之惟一關鍵，亦即我第二期抗戰最後勝利之開始。」⁶²18 日，嚴令各戰區（除南寧方面）

⁵⁶ 「劉斐呈蔣中正國軍冬季攻勢作戰計畫」（1939 年 10 月 23 日），〈全面抗戰（一）〉，《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34-008。

⁵⁷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下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667-669。

⁵⁸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一），頁 667。

⁵⁹ 「第六第九兩戰區二十八年冬季攻勢作戰經過」（1939 年 12 月），〈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經過（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8-010702-00039-003。

⁶⁰ 如若考量表面上的數字與實際（差、假、病、缺）的落差，國軍攻勢兵力以五成計算應較為確實。〈二十八年冬季攻勢使用兵力統計表〉（1939 年 11 月中旬），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一）》，第四篇第十九章第二節插表第十七，原無頁數。國軍總兵力確數隨戰局發展和補充時有變動，中央無法完全掌握，冬季攻勢前的數據為 3,114,704 人，與戰後統計的正文表 1 有所出入。

⁶¹ 「蔣中正電薛岳」（1939 年 12 月 4 日），〈革命文獻—抗戰方略：重要指示〉，《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4-045；「蔣中正電示衛立煌」（1939 年 12 月 4 日），〈籌筆—抗戰時期（三十）〉，《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30-013。

⁶² 「蔣中正電各戰區司令長官」（1939 年 12 月 7 日），〈革命文獻—抗戰方略：重要指示〉，《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4-046。

不得硬攻據點。⁶³同日並手諭軍令部長徐永昌，指示冬季攻勢對國外宣傳要旨。⁶⁴27日，電湯恩伯指示第五戰區冬季攻勢之部署，應切實截斷平漢鐵路與襄花公路，並相機向武漢盡力威脅，粉碎敵打通粵漢路之計畫。⁶⁵

表5 冬季攻勢各戰區作戰任務表

戰區	轄區	司令長官	作戰任務
第一戰區	豫境及皖之一部	衛立煌	助攻。可使用總兵力步兵11個師2個旅，騎兵3個師1個旅，目標攻擊開封、博愛，牽制敵人。
第二戰區	晉及陝之一部	閻錫山	主攻 。可使用總兵力步兵35個師11個旅，騎兵2個師1個旅，目標切斷正太、同蒲鐵路交通，並肅清晉南三角地帶。
第三戰區	蘇南、皖南及浙閩兩省	顧祝同	主攻 。可使用總兵力27個師1個旅，目標截斷長江交通，佔領沿江陣地，以輕重砲兵火力及敷設水雷封鎖長江。
第四戰區	兩廣	張發奎	助攻。可使用總兵力19個師2個旅，目標一部攻擊潮汕，主力掃蕩廣九鐵路與南寧之敵。
第五戰區	皖西、鄂北、豫南	李宗仁	主攻 。可使用總兵力步兵46個師2個旅，騎兵1個師，目標掃蕩平漢鐵路線南段，再挺進漢口，同時截斷公路交通。
第八戰區	甘寧青綏	朱紹良	助攻。可使用總兵力步兵10個師10個旅，騎兵4個師6個旅，以一部協同第二戰區作戰，主力攻擊歸綏附近之敵。
第九戰區	贛北、鄂南及湘省	薛岳（代）	主攻 。可使用總兵力51個師1個旅，目標向粵漢鐵路北段攻擊，並向武昌挺進，同時攻擊南昌及南潯鐵路。
第十戰區	陝西方面	蔣鼎文	助攻。仍任原河防。
魯蘇戰區	蘇北、魯省	于學忠	助攻。策應沿江方面之作戰。
冀察戰區	冀察	鹿鍾麟	助攻。策應山西方面之作戰。

資料來源：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一），頁667-668；《二十八年冬季攻勢作戰計劃使用兵力一覽表》（1939年11月中旬），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一）》，第四篇第十九章第二節插表第十六，原無頁數。

⁶³ 「蔣中正條諭張治中」（1939年12月18日），〈革命文獻—抗戰方略：重要指示〉，《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4-047。張治中係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該命令由張治中轉發各戰區。

⁶⁴ 「蔣中正電示對外國宣傳要旨」（1939年12月18日）、「蔣中正電示徐永昌」，〈籌筆—抗戰時期（三十）〉，《蔣檔》，典藏號 002-010300-00030-035、002-010300-00030-036。

⁶⁵ 「蔣中正電湯恩伯」（1939年12月27日），〈革命文獻—抗戰方略：重要指示〉，《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04-048。

國軍發動冬季攻勢以前，日軍為切斷國軍西南補給線，先一步向廣西南部發動進攻，是為桂南會戰。11月15、16日，日軍第五師團登陸廣西南部欽州灣，快速北進，月底攻下桂南重鎮南寧，並佔據外圍據點崑崙關等地。⁶⁶蔣中正速調部隊反攻南寧，先後集結25個師的兵力、飛機百架及地方團隊，由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指揮，12月18日開始向日軍反攻，以西、北、東三路軍向南寧周圍日軍包圍。日軍遭受國軍壓力，抽調在廣東的第十八師團、近衛旅團增援桂南，先後與國軍在崑崙關及賓陽附近演成兩大戰鬥，歷時兩月餘。崑崙關方面，國軍出動擁有裝甲部隊的第五軍，一度殲滅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一部，擊斃旅團長中村正雄。賓陽方面，日軍增援部隊未於南寧北面、邕江北岸正面進攻集結於該處的龐大國軍，而是沿邕江南岸，向南寧東側展開大迂迴作戰，經過甘棠再向北突進到國軍後方重鎮賓陽，迅速包圍國軍。國軍後路被斷，趕忙撤退，傷亡甚重，桂南會戰至是結束。⁶⁷

冬季攻勢受到桂南會戰影響，負責廣西的第四戰區部署有所調整，其他戰區仍先後發起攻勢。主攻的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戰區以截斷日軍長江交通為目標，先後在粵漢鐵路北段、平漢鐵路南段及南京、九江間地區攻擊日軍。第三戰區以14個師及配屬大量火炮，攻擊沿江防守1個師團的日軍；第五戰區在襄河東岸與日軍拉鋸；第九戰區以9個師圍攻鄂南大沙坪幾逾一個月；至於第二戰區，因與中國共產黨掌握的新軍衝突（晉西事變），未能有所發揮。助攻方面，第一戰區一度攻入開封，焚毀日軍倉庫物資；第八戰區一度攻克綏遠重鎮包頭；魯蘇、冀察戰區於敵後攻擊襲擾，破壞交通。至1940年1月底，冬季攻勢終止，而小規模戰鬥延至3月底始漸趨沉寂。⁶⁸

⁶⁶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戰〈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44-51。

⁶⁷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桂南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1-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桂南會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129-16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戰〈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59-87。

⁶⁸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一）》，頁2；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八）》（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頁581-582。

戰鬥之激烈，可以從日軍紀錄看到。在大沙坪的日軍，為步兵第三十六旅團司令部，以第三大隊（僅有第十、第十二中隊）負責警備，附有一些野砲。12月12日起，遭國軍大規模進攻，日軍警備各陣地遭突破，聯絡、補給、通信全被切斷，司令部遭直接射擊，各隊被分割包圍，各自為戰。入夜雙方展開肉搏戰，投擲手榴彈，喊聲、突擊喇叭聲鳴響不斷，數夜反覆爭奪陣地。最後日軍成功守住陣地，但遭到相當傷亡。⁶⁹

依據國軍的統計，從1939年11月下旬到1940年3月底，讓日軍的傷亡達到77,000餘人，各戰區「概能按照計畫達成任務，獲得預期效果，確收消耗敵人之目的，陷敵於一籌莫展之窘境」。⁷⁰

三、政略、速勝與情報：蔣中正為何發動四次反攻？

經過上文梳理，可見武漢會戰以後整個1939年，蔣中正不斷下令國軍反攻，國軍也數度展開規模大小不同的攻勢。然而，認為國軍消極抗戰的批評，不絕如縷，不僅後來在中國的美軍顧問如此批評，美軍顧問之前的蘇聯顧問亦有類似非難。

1940年底到中國擔任蘇聯軍事總顧問的崔可夫（Vasily Ivanovich Chuikov）在回憶錄指出：1938年年底以後，蔣中正照樣不採取抗日的積極軍事行動，而保存自己的實力；國民黨上層，特別是高級將領之間從來沒有一致配合過，每個人都竭力保存自己的部隊，尤其是武器，捨此他就沒有分量；蔣對高級將領，尤其是對戰區司令長官的權威是不牢固的，毫無疑問，蔣害怕他們當中每一個人效法汪兆銘投靠日本。⁷¹若崔可夫的觀察為真，蔣中正或各戰

⁶⁹ 步兵第四十五聯隊史編纂委員會編，《步兵第四十五聯隊史》（東京：步兵第四十五聯隊史編纂委員會，1981），頁298-299。

⁷⁰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頁385。

⁷¹ 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頁72。

區司令長官僅欲保存自己的力量，那麼 1939 年幾次反攻目的為何？是否如多恩所言，主要是政略考量，爲了爭取外國援助做做樣子？

蔣中正領導國軍抗戰，的確時刻關注政略。1937 年淞滬會戰末期，蔣爲了在比利時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獲得國際同情，下令死守上海，最後不及撤往後方永久國防工事，全軍潰退。⁷²1939 年的反攻，是否複製先前的樣態，爲了爭取外國援助、干涉等政略目的而發動，以下一一檢證。

首先，是否爲爭取外國援助？中日戰爭爆發初期，國府抗戰幾乎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蘇聯是極少數的援助國家。⁷³美國方面，延續其孤立主義立場，中日戰爭初期維持中立，經過中方人員不斷爭取，中美於 1939 年 2 月簽訂桐油借款，惟此一借款只可用於購運美國農產品及工業品，不得移作別用，美國對中國軍火援助可說微乎其微，更無任何貸款。⁷⁴1939 年底，冬季攻勢正在進行，蔣中正電駐美大使胡適轉致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電文，請美方近期設法援助中國，以現款供中國法幣與金融提高信用。⁷⁵此一請求獲羅斯福正面答覆，表示美國政府願提供適宜而實用之援助，已對遠東局勢密切關注。⁷⁶第二次借款滇錫借款遂於次年 4 月簽約生效，總額 2,000 萬美金。⁷⁷因此，蔣確實可能藉發動攻勢展示犧牲，向蘇聯、美國或其他國家博取同情，爭取更多援助。不過，在借款交涉緊要關頭發動反攻、爭取同情可以理解，歷時整年不斷籌畫消耗資源的反攻，恐怕不僅是爭取外國援助單一因素可以解釋。

⁷² 張發奎口述，夏連蔭訪談記錄，胡志偉譯註，《張發奎口述自傳》（臺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頁 353-359。

⁷³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64-66。

⁷⁴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87），頁 189-197。

⁷⁵ 「蔣中正電胡適」（1939 年 12 月 19 日），〈革命文獻一對美外交：一般交涉（一）〉，《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28-022。

⁷⁶ 「羅斯福電蔣中正」（1939 年 12 月），〈革命文獻一對美外交：一般交涉（一）〉，《蔣檔》，典藏號 002-020300-00028-023。

⁷⁷ 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 1937-194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91-92。

其次，是否為爭取國際干涉？1939 年歐洲局勢變動劇烈，9 月 1 日歐戰爆發，蔣中正心心念念國際干涉解決中日戰爭。⁷⁸藉由發動攻勢，促成國際直接干涉，或一舉結束中日戰爭，似乎是合理的做法。然而，1939 年國際變化風雲詭譎，蔣不斷猜測大國結盟情形，結果與預想大相逕庭。他原猜測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締結，蘇聯將放棄歐洲而經營遠東以對日。⁷⁹結果蘇聯同時與日本訂定諾門罕戰役停戰協定，對遠東緩和，而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日本得以在東亞坐大，全力侵華，使他非常沮喪。⁸⁰是以，歐戰爆發後國軍對日發動冬季攻勢，蘇聯不太可能順勢參戰，不能獲得預想的國際干涉。國際干涉只可說是歐戰爆發前國軍前三次反攻的背景因素之一，不是歐戰爆發後才發動的冬季攻勢主因。

再者，是否為打擊離開重慶陣營的汪兆銘？汪兆銘原為中國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於 1938 年底離開重慶陣營，與日本進行和談，擬重新建立親日國民政府。蔣中正是否藉發動攻勢，堅持自身正統性，並且干擾汪政權的成立？事實上，汪的動向的確受蔣密切關注，苦思焦慮、聚精匯神於此。⁸¹1939 年 3 月間，蔣派情報人員赴越南河內「制裁」汪兆銘，沒有成功。⁸²蔣並曾將日軍軍事行動與汪兆銘結合在一起，認為汪洩漏國府軍事機密，促使日軍向南昌發動攻擊。⁸³可見蔣確實有可能為了打破汪提供日軍機密所造成的局面，而數度發動反攻。然而，1938 年 11 月底南嶽軍事會議便已議決轉守為攻，而汪離開重慶陣營是在會後半個月，可見就算沒有汪的因素，反攻也是確定的戰略，即便後來的反攻或有爭取正統性的意圖，應該不會是主因。綜而論之，外國援助、國

⁷⁸ 蔣在日記不斷透露這個「國際解決戰略」。如 1938 年 7 月提到「中倭戰事問題實為國際問題，非有國際干涉共同解決，則決不能了結」。同年 8 月武漢會戰期間提到「如國際能發生變化，則或能提早解決」。〈蔣中正日記〉，1938 年 7 月 28 日、8 月 31 日。

⁷⁹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8 月 24 日。

⁸⁰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9 月「本月反省錄」。

⁸¹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2 月 31 日「回顧一年來之工作」。

⁸² 蘇聖雄主編，《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導言〉，頁 VIII-IX。

⁸³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4 月 1、15 日。

際干涉、與汪兆銘鬥爭等政略因素，僅可說是國軍發動攻勢的背景，難說是直接原因。

短期政略不是發動反攻的主要考量，蔣發動反攻的原因，或可回到軍事本身尋找。冬季攻勢發動之初，蔣給各戰區司令長官的通電，透露發動這場攻勢的目的。他說所以發動冬季攻勢，是因為兩年半抗戰的持久消耗，日本已極衰弱，氣候、地形對國軍已十分有利，日本難以再撐下去，透過幾次反攻，將使其受不了而退出戰爭，甚至完全崩潰。⁸⁴

蔣期待藉幾次反攻促使日軍崩潰，可與當時所謂「速勝論」延伸討論。1938年4月間台兒莊之役勝利之後，國府輿論界一度瀰漫著認為日本受到嚴重持久消耗，中國勝利在望的樂觀情緒。《大公報》4月25、26日的社論，大力提倡這個看法。⁸⁵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於同年5、6月間發表〈論持久戰〉演講，稱這種說法是「中國速勝論」，也就是毫無根據的樂觀傾向，把日本戰爭潛力估計過低，並且期待短時間國際變化，將抗戰前途主要寄託在外國援助的上面。毛批判速勝論，認為是「政治上軍事上的近視眼」。⁸⁶

毛澤東沒有明說誰主張速勝論，論者或歸諸蔣中正為首的國民黨和中共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急性病」和「教條主義」同志。⁸⁷蔣中正是否為速勝論者，可以從他對日本人的認識來考察。他認為「倭人氣短量窄」，「倭寇民族特性急而且短，其國徽為櫻花，其人好剖腹與自殺，此皆急性短命之表徵，而其軍事學術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決速戰為性能」。⁸⁸蔣並且梳理日本戰史，計算中日甲午戰爭延續8個月，日俄戰爭延續16個月，有中日戰爭不會

⁸⁴ 「蔣中正電各戰區司令長官」（1939年12月7日），〈革命文獻—抗戰方略：重要指示〉，《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04-046。

⁸⁵ 〈對抗戰前途之一般考察〉，《大公報》（天津），1938年4月25日，第2版「社評」；〈這一戰〉，《大公報》（天津），1938年4月26日，第2版「社評」。

⁸⁶ 毛澤東，〈論持久戰〉，《解放》，期43-44合刊（1938年7月），頁3-4。本文原為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的演講。

⁸⁷ 龔古今、唐培吉主編，王沛、楊衛和編寫，《中國抗日戰爭史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上冊，頁235-236。

⁸⁸ 〈蔣中正日記〉，1938年「雜錄」11月8、11日。

延續太久的期待（截至 1939 年元旦，戰爭已經延續 18 個月）。⁸⁹從蔣的日記或講詞考察，也有期待速勝的跡象。1938 年 4 月台兒莊之役結束後，自記：

「軍事至此，勝負之數已定其半，敵軍不僅無勝利之望，其敗象已漸顯明矣。若能維持現局至本月底，則勝算可操矣。」⁹⁰同年 8 月武漢會戰期間，自記：「如九月中仍能在現陣線對峙，則可使形成持久停頓之狀態。但亦必須至明年春季，敵軍方得屈服，如國際能發生變化，則或能提早解決，亦未可知耳。」⁹¹

種種跡象顯示，蔣中正就是毛澤東批判的速勝論者，但是，也可以找到很多蔣認為戰爭不會很快結束，需要自力更生的講詞或日記內容。1938 年年底的南嶽軍事會議，蔣明示：「我軍將領，必須覺悟，以後抗戰勝利之基礎，全在於我能獨立作戰，自力更生。事事要節約緊縮，勤勞忍痛，獨立自主，準備作五年十年之苦鬥。」⁹²1939 年 3 月蔣與軍令部長徐永昌談時局，告以「中央放棄武漢，遷移重慶後，則抗戰時期愈長愈好，以短期內如果和平，則中央對內對外皆不及準備與布置」。⁹³同年 9 月歐戰爆發、日蘇簽訂停戰協定後，蔣自記：「此後我國自處之道反形簡單，即對內建設四川根據地，對倭更作持久抗戰到底，以待世界戰爭之結果而已。」⁹⁴年底，冬季攻勢緊鑼密鼓規劃與發動，蔣同時在預定中央與地方的三年計畫。⁹⁵

蔣中正估計的抗戰時間又是短、又是長，顯然不盡合所謂速勝論，究該何解？一個可能解釋，是蔣變來變去，無一貫戰略思想。但是，一個變來變去的人，難有長遠規劃，而蔣於中日戰爭顯有長期打算，從戰前國防計畫，到武漢會戰後的戰略調整，都是以長時間做準備，他心中應該有一套戰略思考，不致輕易變來變去。或許一種推論相對合理，即蔣的想法是屬多重，既期待短時間

⁸⁹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 月 1 日。

⁹⁰ 〈蔣中正日記〉，1938 年「雜錄」4 月 2 日。

⁹¹ 〈蔣中正日記〉，1938 年「雜錄」8 月 31 日。

⁹² 蔣中正，〈南嶽軍事會議手訂各項要則及第一期抗戰之總評〉（1938 年 11 月 28 日），收入《蔣總集》，卷 15，頁 556。

⁹³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3 月 4 日。

⁹⁴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9 月「本月反省錄」。

⁹⁵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3 日。

幾次反攻或國際事件可以逼日本退出戰爭，而這確有前例可循，如 1932 年的一二八事變；也設想抗戰不是一時半刻可以結束，故積極建設大後方，規劃長時間以拖待變，或期待更長時間的國際變化。

同樣的，是唯一依賴國際解決，或樂觀認為發動幾次反攻便可自力勝敵，蔣的想法也屬多重。在史料中，可以看到很多蔣欲自力勝敵的論述，也有很多對國際解決抱持高度期待的想法。如冬季攻勢進行時，自記「倭國內部亂象，中國抗戰其最大目的，在使其內部崩潰，而恢復九國公約會議猶其次也」，⁹⁶看似以自力為重；然而沒過幾天，卻又自記「如何使中倭戰事變為世界戰爭，使將來和會得有利之地位」，⁹⁷反重視國際解決。

質言之，蔣的想法在國際局勢有利時，期待國際解決；國際局勢不佳時，則盼望幾次反攻促成過度擴張的日本內部崩潰。對於抗戰時間的判斷，若整體局勢有利，期待戰事早些結束；若局勢不利，則持久消耗下去，以拖待變。凡事留有退路，是領導人常態，不能說他是個速勝論者。

以後見之明觀之，日本對於戰爭有強大韌性，即便後來與資源豐富的美軍作戰，也撐了四年之久，動員軍隊總數 700 多萬人，遠超過對美開戰前的 100 多萬人。⁹⁸1939 年日本的軍費為 75.8 億餘日圓，到 1944 年膨脹十倍為 778.8 億餘日圓，仍未崩潰。⁹⁹中國最後還是藉國際之力結束戰爭，蔣中正多重考量的一個重要層面——期待持久消耗日本，自力勝敵——並未發生，甚至可說是對日本國力認識的極大錯誤。那麼，除了他個人對日本人文化或日軍歷史觀察有誤，是否有其他原因讓他弄錯了？

情報應該是一個關鍵。國民政府情報機構很多，如國際問題研究所（國研所）、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軍委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

⁹⁶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2 月 21 日。

⁹⁷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2 月 24 日。

⁹⁸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付表 5，「陸海軍兵力の變遷」，頁 490。

⁹⁹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付表 15，「昭和期の軍事費」，頁 503。

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局）、軍委會辦公廳機要室等。各情報機構的對日情報紛雜，甚至矛盾，但多導向日本國內動盪，續戰困難。¹⁰⁰

國研所方面，主任王芃生上呈諸多情報，呈現日軍不穩或日本國內可能崩潰的傾向。一則台兒莊之役期間，1938 年 3 月 17 日上呈的情報指出：「新運至滬之敵軍，則常生騷動，實行反戰。」¹⁰¹4 月 7 日上呈的情報復指出，日本要人與經濟界權威「最近均公然自認日本財政經濟，已逼近崩潰之時期」。¹⁰²一年過後，日本沒有崩潰，但王芃生還是提供相近觀察，1939 年 4 月的一則情報提到：「敵國內物價高漲，近益無法制止，人民將瀕於破產」；王芃生註記：「據敵國一般人士意見，倘能速了中日戰爭，尚有挽救之法，否則日本國家經濟及社會經濟必至破產。」¹⁰³同年底國軍冬季攻勢命令發布前後，王芃生又一情報指出「敵米糧恐慌深化，影響軍糧」云云。¹⁰⁴王芃生這樣的情報還有很多，所呈現的均是日本內部動盪不安，即將崩潰的趨勢。

軍令部方面，曾於 1938 年 3 月間擬訂〈敵經濟能力判斷表〉，指明：「敵如不在我國被佔領各區域內濫發紙幣，掠奪現金及各種資源，則其國內之經濟能力，迄至明年此日，當入山窮水盡之境矣。」¹⁰⁵同月駐美陸軍武官郭德權的情報指出，美陸軍部要人表示，日本已銷耗所存彈藥全部 40% 以上，常備軍似已全部出動，經濟狀況已見窘迫，美政府認為日本已成戰敗之局。¹⁰⁶4 月 26

¹⁰⁰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 99-150。

¹⁰¹ 「王芃生電蔣中正報告」（1938 年 3 月 17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七年（二）〉，《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282-015。

¹⁰² 「王芃生等電蔣中正」（1938 年 4 月 7 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三）〉，《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10-047。

¹⁰³ 「王芃生等電蔣中正」（1939 年 4 月 10 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一）〉，《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18-055。

¹⁰⁴ 「王芃生電蔣中正」（1939 年 11 月 17 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四）〉，《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21-113。該報告於 11 月 20 日上呈蔣中正，蔣應是當日以後看到，而冬季攻勢命令是 11 月 19 日頒布。

¹⁰⁵ 〈敵經濟能力判斷表〉（1938 年 3 月 13 日），《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5240。

¹⁰⁶ 「王芃生電蔣中正」（1938 年 3 月 16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七年（二）〉，《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282-015。徵集情報為各國武官的主要工作之一，國府駐外武官由軍令部管轄。

日，軍令部駐香港特派員有類似報告：「由香港情報局得來消息，謂日本對華戰爭，已感極端困難，經濟方面，到下半年實難維持。」¹⁰⁷迄該年下半年，日本經濟還是維持下去，軍令部情報依然如此，1939年5月的一則情報，呈現日本內部極其困難：「敵鑑於國際環境之惡劣，國內各工商業之停滯，財政之破產，原料之缺乏，將士之厭戰，總崩潰迫在目前，不得不隨風轉舵。」¹⁰⁸

軍統局方面，1939年5月間上呈情報，透視日本國內政局，提到「敵國內一般反戰暗潮，確日在高漲，雖經敵政府嚴密高壓，收效甚微」。¹⁰⁹同月另一則情報指出「最近一月來，敵過內部對時局主張之矛盾與紛爭，已發展至極高度，且尚在演變中」。¹¹⁰

其他如行政院長孔祥熙、德國顧問施太乃斯（Walther Stennes）皆有日本軍隊和國內動盪的情報。孔祥熙於香港布線，不時有情報回傳，1939年6月的一則情報指出「日軍前途極悲觀」。¹¹¹施太乃斯是德國軍事顧問，顧問團雖已被德國政府召回，他個人仍留在國軍工作。在1939年底冬季攻勢命令發布前的一則情報，他指出日本「國內將發生軍事暴動」，日本政府已知悉此暴動計畫，保守黨已得日皇許可，準備對策應付軍事暴動，使國家政治脫離軍部橫霸勢力。¹¹²由於冬季攻勢籌備良久，難說施太乃斯的情報促成攻勢，但該情報加強蔣日本可能崩潰的信念，應屬合理。

受國府各情報機構對日情報的影響，蔣判斷日本國內動盪，日軍缺乏續戰能力。至於國軍歷次作戰的報告，顯示日軍死傷慘重，也加深上述情報的印象。

¹⁰⁷ 「軍令部電蔣中正」（1938年4月25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三）〉，《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10-061。

¹⁰⁸ 「軍令部電蔣中正」（1939年5月1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四）〉，《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21-068。

¹⁰⁹ 「戴笠賀耀組等蔣中正」（1939年5月30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一）〉，《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18-023。

¹¹⁰ 「戴笠賀耀組電蔣中正」（1939年5月27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一）〉，《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18-025。

¹¹¹ 「香港情報」（1939年6月3日），〈敵偽組織（二）〉，《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10-012。

¹¹² 「施太乃斯致蔣中正報告」（1939年11月12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四）〉，《蔣檔》，典藏號 002-080200-00521-112。

1939 年的三次會戰南昌會戰、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國軍都以爲成功達成消耗日軍的目標。在南昌會戰，國軍統計敵軍聯隊長以下官兵傷亡約 3 萬人（國軍傷亡約 5 萬餘人），雖然失去南昌這個重要城市，仍認爲「達成牽制消耗之目的」。¹¹³隨棗會戰國軍統計日軍傷亡，有 21,450 人（國軍爲 28,037 人）。¹¹⁴第一次長沙會戰統計日軍傷亡，更達 3 萬 3 千餘人（國軍第九戰區傷亡失蹤約 4 萬人）。¹¹⁵從國軍數據來看，國軍傷亡雖然慘重，但有效打擊日軍，兩軍傷亡比例相差不多。同樣依照國軍數據，整個 1939 年，日軍負傷 273,550 人、陣亡 136,245 人、被俘 5,920 人，總計 415,715 人，而國軍負傷 176,891 人、陣亡 169,652 人，總計 346,543 人，反較日軍爲輕。¹¹⁶爲求宣傳，誇大戰績是各國軍隊常態，國軍亦傾向加強宣傳大捷。¹¹⁷身爲最高統帥的蔣中正，是否相信國軍真能給日軍那麼大的殺傷？

看來他是信了一些。蔣雖知國軍迭有謊報情形，¹¹⁸第一次長沙會戰後仍自記：「贛、湘戰事復起，武長路方面損失頗大，然能照意圖部署，已與敵軍之大打擊，使之不敢再攻他處，則目的達矣」；¹¹⁹「本週敵軍潰敗，湘北大捷，此役實開轉敗爲勝之機運」。¹²⁰當讀到 1939 年 5 月底日軍發布的公報——七七事變至 1939 年 4 月間日軍戰死 59,098 名——蔣判斷實際數目要「以十乘之」，「斷其戰死者爲五十九萬名以上，而傷者不與也」；¹²¹之後又讀到 1939

¹¹³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一）》，頁 2。

¹¹⁴ 〈隨棗會戰第五戰區敵我傷亡統計表〉（1939 年 5 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隨棗會戰》，第四篇第十六章第三節插表第五，原無頁數。

¹¹⁵ 「第九戰區長沙會戰人員傷亡失蹤統計表」（1939 年 10 月 31 日）、「第九戰區長沙會戰敵軍傷亡概見表」，〈長沙抗日會戰案（一次）〉，《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28/543.6/7173B。

¹¹⁶ 〈抗戰以來我敵傷亡統計表〉（1945 年 6 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3163。

¹¹⁷ 何成濬著，沈雲龍校註，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上冊，頁 149。

¹¹⁸ 如 1937 年淞滬會戰時，蔣電駐滬軍事代表宋子文、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告以「前方戰報皆須統一而且確實，不得謊報，自墮信譽」。「蔣中正電宋子文顧祝同」（1937 年 9 月 1 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二）〉，《蔣檔》，典藏號 002-090106-00012-264。

¹¹⁹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9 月「本月反省錄」。

¹²⁰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0 月 7 日「上星期反省錄」。

¹²¹ 〈蔣中正日記〉，1939 年 12 月「續十二月卅一日回顧錄」。

年 12 月底日軍的公報——1939 年 1 月至 11 月底，日軍陣亡者 27,000 人——蔣判斷「可知其為二十七萬名」。¹²²

實際上，日軍傷亡遠比蔣中正估計的少。據日軍內部統計，日軍主力第十一軍於南昌會戰戰死約 500 人，負傷約 1,700 人；隨棗會戰戰死約 650 人，負傷約 1,800 人；第一次長沙會戰戰死約 850 人，負傷約 2,700 人。¹²³三次會戰的傷亡，大概是國軍估計的十分之一。日軍已是現代國家，對官兵掌握相對充分，死傷有名可稽，其非宣傳用的內部報告，相對國軍估計應較為精確。¹²⁴至於幾場會戰的勝敗，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日軍的目標都不是奪城，而是打擊國軍後便回撤，他們自認達到作戰目標，也清楚認識主動撤退，提供了國軍製造擊退日軍的宣傳口實。¹²⁵

回到國府情報的討論。是否國府情報機構太不實際，各部謊報戰果太過嚴重，情報工作太差誤導了蔣中正？蘇聯軍事顧問不這樣認為。總顧問崔可夫感到「中國的偵察機關工作得不壞」，他核對有關在華日軍人數和個人紀錄與官方材料，發現幾乎沒有甚麼不同。¹²⁶在崔可夫之前的總顧問切列帕諾夫，支持日本傷亡慘重的情報，判斷徐州會戰「使日本侵略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武漢會戰後「中國軍隊的實力增強了，侵略者的力量消耗殆盡了」，「敵人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戰線日益擴展，交通線越來越長，人力感到不足」；對於四月攻勢，他估計中國軍隊傷亡 5 萬 3 千人，而日本死亡 4 千 3 百人，傷 4 萬 8 千人，「雙方的損失大致相等」。¹²⁷除了上述情報，切列帕諾夫帶領的顧問團，於 1939 年中為國軍規劃反攻，調查敵我情勢，認為「中國軍隊的步兵

¹²² 〈蔣中正日記〉，1940 年日記開頭之筆記。

¹²³ 〈第 11 軍綜合戰果一覽表（自昭和 13 年 7 月至昭和 15 年 2 月）〉（昭和 15 年 3 月 8 日），《第 11 軍軍狀報告・昭和 13 年 7 月中～15 年 3 月 8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1112071800。

¹²⁴ 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 21-26。

¹²⁵ 稻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大將資料・戰場回想篇》（東京：原書房，1970），頁 335。

¹²⁶ 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頁 46-47。

¹²⁷ 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 626-628、631-632。切列帕諾夫又譯切列潘諾夫。

比日軍多一倍，步槍、輕重機槍多兩倍。……中國軍隊在人數和步兵武器上就佔有絕對優勢」；「中國軍隊的部署使其基本上能夠以第五戰區從北面、第九戰區從南面對敵軍武漢集團實施突擊並將其擊潰，攻佔武漢三鎮」。¹²⁸冬季攻勢期間的蘇聯總顧問福爾根，在冬季攻勢結束後仍認為：「由於敵軍之失敗，我軍之積極與戰鬥力之頑強，無疑的將使敵軍士氣爾後愈益減低，其戰鬥力愈趨薄弱」；「凡被我擊破之敵軍部隊（旅團或師團），其士氣已為動搖，爾後隨戰況之推進，其動搖自必加劇，此不僅影響其軍隊之戰鬥能力，且影響其國內一般民眾之政治情緒」。¹²⁹

不僅蘇聯顧問的情報顯示日軍戰損很高，他國外交官或武官的情報也有類似狀況。英國駐華大使卡爾（Archibald Clark Kerr）在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指出長沙會戰中國宣稱日本傷亡約 3 萬人，日本對此數字嗤之以鼻，但是這個數字，被在戰場的法國聯絡官所證實。在另一份年度報告，卡爾明指日軍不僅無法達到其作戰目標，而且帶著嚴重損失，被國軍驅逐撤回原來陣線。¹³⁰美國駐華武官卡爾森（Evans Fordyce Carlson）於研究中國軍隊的書中指出（1940 年出版），1938 年 11 月前（武漢會戰前）日軍傷亡約 50 萬人，35 萬人死亡或重傷，15 萬人輕傷，日本 100 萬軍隊分布在廣大的東亞，經濟情況每下愈況，國會嚴厲批評在中國的軍事行動，國內缺乏電力、燃料和米糧，軍人對中國戰事並不熱衷。¹³¹種種論述，可見外籍官員或情報人員也無法確實掌握日軍傷亡、戰力或國家戰爭潛力，國府情報機構並非特例。

事實上，經過兩、三年的戰爭，日本國內的確爆發糧食危機，後來美國對日本經濟壓迫，日本充斥不安，國民生活困窮，1939 年底至 1940 年，被視為

¹²⁸ 卡利亞金著，賴銘傳譯，《沿著陌生的道路》，頁 322、328。

¹²⁹ 「總顧問福爾根對於第三戰區冬季攻勢作戰經過之報告」（1940 年 1 月 22 日），〈全面抗戰（十八）〉，《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51-006。

¹³⁰ Sir A. Clark Kerr to Viscount Halifax, Shanghai, November 7, 1939 and Sir A. Clark Kerr to Viscount Halifax, Chungking, May 24, 1940, in Robert L. Jarman,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2001), vol. 6, pp. 440, 503.

¹³¹ Evans Fordyce 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pp. 74, 81-83.

中日戰爭期間日本的「黑暗時期」。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陸軍中央和支那派遣軍，在戰爭指導上相互衝突。¹³²軍隊急速膨脹，官兵教育訓練不足，軍紀廢弛、士氣低下等情況也都出現。¹³³被國軍俘虜的日軍，口供亦顯示日軍士兵普遍厭戰。¹³⁴這些問題其實是列強面對長期戰爭的常態，不必然導致崩潰而退出戰爭。

要之，國府或外來情報讓蔣中正以為，日本已到攻勢頂點，難以再撐下去，國軍發動反擊，可促使日本軍隊譁變或資源過度膨脹而拖垮國民經濟，進而造成動盪或革命，使中國獲得最後勝利。這應是 1939 年蔣中正發動四次反攻的直接原因。

但是，這仍然沒有辦法解釋，就在國軍身邊的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國軍的作戰計畫，眼看著國軍規劃並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反攻，為何仍然感到國軍反攻消極。如果國軍是在 1939 年底冬季攻勢以後，才認識到自身戰力不足，漸漸不發動攻勢，遭致後來美軍的批評，何以在此之前，蘇聯顧問就已感到國軍有這樣的傾向？冬季攻勢是否真為蔣對戰局樂觀或悲觀、攻勢或守勢、積極或消極的分水嶺？攻勢對國軍而言，還希望達到甚麼目的？這些問題，藉由挖掘國軍戰略戰術思想的底蘊，或可獲得解答。

四、國軍戰略戰術思想再探

蔣中正 1939 年發動四次反攻的戰略戰術為何，他自己已有說法。1938 年底決定國軍戰略戰術關鍵性的南嶽軍事會議上，他在訓話時指出：

我們現在就是誘敵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

¹³²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松元崇、庄司潤一郎、川島眞，《決定版・日中戦争》（東京：新潮社，2018），頁 184-19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頁 146。

¹³³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東京：日本評論社，1987），上卷，頁 235-240。

¹³⁴ 〈張發奎日記〉，1939 年 8 月「本月大事預定表」。

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一定先要引誘他到長江流域來。現在我們這種戰略的布置已經完成。……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大家要知道：敵人兵力的使用，到現在為止，已經到了最大限度。¹³⁵

會議上蔣梳理盧溝橋事變以來的戰略，在華北持久消耗敵軍，不爭一城一地，節節抵抗，誘敵深入，引敵南下到長江流域，使日軍戰力消耗到最大限度，國軍再反守為攻。整個論述，在第一期抗戰，於戰略與戰術上皆採守勢，即「守勢防禦」、¹³⁶或「專守防禦」；¹³⁷到第二期抗戰，再轉守為攻，採取攻勢。

第二期抗戰暫且不論，第一期抗戰是否真如蔣所說那樣進行？業有研究指出，蔣戰前規劃的華北對日戰略，在北布置湯恩伯部，南則於河南、隴海線部署規模更大的劉峙集團，含括衛立煌部、孫連仲部、胡宗南部等戰力較強的部隊。計畫在開戰之初，華北地方軍就地抵抗，劉峙集團開進華北增援，佔領陣地，示以決心，以戰逼和；若戰事擴大，則積極進取，與日軍決戰、第一次會戰、第二次會戰；而若戰況不利，再改採持久戰，節節固守，逐步消耗敵人。開戰之後，蔣以戰前規劃為基礎調動部隊。劉峙集團源源不斷進入華北，國軍固守華北平津南面的滄保、滄石防線，構築工事，蔣不斷細瑣指示工事構築，待陣線穩固後發動反攻，奪回平津。平津西北側的南口，湯恩伯部死守該地，牽制日軍，和劉峙集團分出的衛立煌部裡應外合，夾擊日軍。¹³⁸因此，蔣在南嶽軍事會議陳述不重視華北的決戰、不爭一城一地、節節抵抗、誘敵深入，並

¹³⁵ 蔣中正，〈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1938年11月25日），收入《蔣總集》，卷15，頁486-487。

¹³⁶ 所謂守勢防禦，戰略上和戰術上皆採守勢的作戰行為稱之。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海軍年表（付：兵語・用語の解説）》（東京：朝雲新聞社，1980），頁385。

¹³⁷ 專守防禦又稱持久防禦，單以防禦敵人為目的，盡全力固守一地。戰略研究学会編集，片岡徹也、福川秀樹編著，《戰略・戰術用語事典》（東京：芙蓉書房，2003），頁109。

¹³⁸ 蘇聖雄，〈空間換取時間？——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軍事布局（1935-1937）〉，《臺大歷史學報》，期66（2020年12月），頁97-151。

不符史實。開戰之初國軍不僅在華北採取攻勢，上海方面爲了先發制敵，也採取攻勢，後來更擴大爲抗戰初期最大的一場會戰——淞滬會戰。¹³⁹

事實上，抗戰初期國軍的戰略戰術，是戰略上守勢、戰術上攻勢的「攻勢防禦」（「決戰防禦」）。¹⁴⁰這個戰略戰術，同時具有日本、德國、中國軍事思想的背景。日本背景方面，清末以來，大批中國軍人赴日本留學，帶回日本兵學，於各級軍事學校深耕，如陸軍大學、保定軍校等，皆以日本兵學爲教材內容，而日本戰略戰術傾向集中軍力、主動攻擊。德國方面，戰前德國軍事顧問有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陣地戰與主動攻擊之有效，尤其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土耳其的作戰經驗，使其多次建議不應在開戰之初節節向後撤退，應主動向華北進軍，憑藉防禦陣地等待良好時機，主動攻擊日軍，在第一線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給予日軍重創。中國背景方面，傳統孫子、曾國藩等所著經典，有爭取主動的教訓，而國府過去對日作戰經驗，如一二八事變、長城之役，國軍對日激烈抵抗，確能使日軍暫停進攻，可謂以戰逼和之先例。¹⁴¹日軍研究國軍戰法，便將國軍在武漢陷落前的戰法歸類爲「決戰防禦」。¹⁴²因此，抗戰初期國軍不是節節後撤的「守勢防禦」或死守的「專守防禦」，而是相對積極的「攻勢防禦」或「決戰防禦」。

淞滬戰場後來形成固著的陣地戰，不代表蔣僅依託深溝、高壘和厚壁，偏好消極被動的陣地防禦戰。淞滬會戰過程，他實際上是指導將士：「站在主動的地位」，「守的爲主，攻的爲客」，待日軍「一挫再竭，則氣落志衰，士怨

¹³⁹ 蘇聖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期 46（2015 年 12 月），頁 61-101。

¹⁴⁰ 所謂攻勢防禦，戰略上採守勢、戰術上採攻勢的作戰行爲稱之。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海軍年表（付：兵語・用語の解説）》，頁 385。所謂攻勢防禦，帶著決戰目的在一地待敵，敵先攻我，我乘著預期時機或敵給予的時機進行攻擊，也稱決戰防禦。此處所謂「決戰」，非全局性的決一死戰，而是在一定時間空間內，決定一場戰鬥勝敗之戰，所述在戰術層次，而非較高層次的戰略層次。戰略研究学会編集，片岡徹也、福川秀樹編著，《戰略・戰術用語事典》，頁 93-95、109。

¹⁴¹ 蘇聖雄，《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3），頁 340-354。

¹⁴² 〈重慶軍戰法の参考〉（昭和 13 年 12 月-18 年 2 月 11 日），頁 1，《支那一支那事変全般—20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1110495300。

力疲，我們就可以乘機出擊，得到最後的勝利！」¹⁴³亦即，蔣固然重視堅守，但不是消極死撐的防禦，而是藉死守消耗敵軍，待敵我易勢，即發動反攻。他同時頒布的〈抗敵戰術彙錄〉十二條，大多闡述固守陣地、持久不退、消耗敵力，但也強調：「對於敵人，何時出擊，如何出擊，這種訓練，極關重要」，「如果我們一意固守，永不出擊，這決不是應戰的道理，也不是防禦的根本辦法」。蔣以爲：「我們之所以要採取守勢的戰術，就是在最後出擊的充分準備」，「時機到來有了準備而不出擊，就必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達成戰爭的任務！」「等到時機成熟，就要努力出擊，不必稍涉猶豫！」¹⁴⁴

淞滬會戰結束以後，1938 年 1 月間，蔣中正在開封召集第一、第五兩戰區團長以上官長召開軍事會議，再次指示應發揮攻擊精神，他提及「我們務必提起攻擊精神，洗刷怕敵心理，我們要攻擊敵人，敵人才不敢來攻擊我們」，批評「我們高級將領中間，懷著一種保存實力的卑劣心理，……只是望風退卻，帶了部隊步步後撤」，認爲過去的失敗「完全由於我們高級將領，缺乏學問的研究，和無攻擊精神之所致」，因此耳提面命指示：「我們的抗戰，雖是守土戰，自衛戰，但必須厲行以攻爲守的戰略，不好呆守不動，等敵人來打，而要到處活動，積極攻擊敵人。」¹⁴⁵同月另一場召集參謀研究抗日戰術的大型軍事會議，有相類指示：「他要先發制人，陷我於被動地位。我們就要處處立於主動地位」，「要正面強固堅守，側面猛烈攻擊」，「現在敵人深入我們內地，戰線延長，戰區擴大，正是我們厲行主動攻戰的最好機會」。¹⁴⁶這次會議的戰法，與後來南嶽軍事會議甚爲相似，認爲日軍已經深入中國內地，兵力不足且分散，國軍已到轉守爲攻的時候。

¹⁴³ 蔣中正，〈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1937 年 8 月 18 日），收入《蔣總集》，卷 14，頁 609。

¹⁴⁴ 蔣中正，〈抗敵戰術彙錄〉（1937 年 8 月 18 日），收入《蔣總集》，卷 14，頁 612。

¹⁴⁵ 蔣中正，〈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上）〉（1938 年 1 月 11 日），收入《蔣總集》，卷 15，頁 5-8。

¹⁴⁶ 蔣中正，〈抗倭戰術之研究與改進部隊之要務〉（1938 年 1 月 29 日），收入《蔣總集》，卷 15，頁 88-92。

蔣中正主動出擊的指示，因為國軍戰力不足，實踐極其不易。蔣時常指示對日軍側面施行迂迴或包圍的戰法，但國軍裝備素質不如日軍，迂迴往往被阻止，不能即刻成功，日軍反趁機以主力向國軍一點突進；國軍一點遭突破，全線動搖，欲抽回迂迴部隊回援已來不及。¹⁴⁷而若國軍不採上述迂迴戰法，改以正面攻堅，將攻擊重點指向日軍陣地要點，因重兵器缺乏和士兵訓練不足，犧牲又很大。¹⁴⁸由於主動攻擊的困難，國軍指揮官缺乏旺盛企圖心及放膽行動，於後來的武漢會戰再次演變成「專守防禦」，利用地形、工事、消極防禦。¹⁴⁹武漢會戰後的南嶽軍事會議，蔣將戰爭分為兩期，說此前是第一期，故意誘敵深入，而此後為第二期，轉守為攻。其實第一期的過程，他就不斷有轉守為攻或是運動戰、游擊戰的指示，只是國軍受制內部問題，難以實施。

要之，南嶽軍事會議上定調的兩期分法、轉守為攻，不是國軍戰略戰術的「轉變」，更像是蔣中正對整體戰局發展及國軍戰略戰術的歸納綜合。他的訓詞更強調日後國軍應該怎麼做，當中並夾雜著鼓舞士氣的企圖，所述過去的戰史，不能視為史實。反攻不是南嶽會議後的新戰術，是開戰一直以來攻勢防禦的延續，也是蔣認為謹守無法勝敵，進攻才能取勝思想的展現。

蔣中正重視反攻，開戰初期重視一城一地的得失，於華北北上出擊，在上海主動進攻並打成大規模陣地戰，那麼，該怎麼理解蔣於南嶽會議訓詞所言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部隊機動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的「空間換取時間」？易言之，如何解釋蔣訓詞與史實的落差？

其中一個可能解釋是，蔣在開戰後主動進攻但不斷戰敗，他只好說他從頭到尾都在引敵深入，合理化失陷整個華北和長江中下游，並且敗退到平漢鐵路以西的整個過程。誠然，為了激勵士氣，統帥於將士的訓詞合理化自身戰略，是屬正常，但蔣所說僅僅是一套遁詞？

¹⁴⁷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間國軍作戰經驗》（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1940），頁 65。

¹⁴⁸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間國軍作戰經驗》，頁 66。

¹⁴⁹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武漢會戰期間國軍作戰之經驗教訓》（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1940），頁 23-24。

從西方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所揭示的防禦理論，或有益於理解蔣中正或國軍高層在想什麼。《戰爭論》防禦篇指出，純粹防禦與戰爭的理念完全違背，戰爭必須對敵人的打擊予以還擊。戰爭的防禦形式不是一面簡單的防盾，而是一種由有良好的指導的打擊所構成的防盾。防禦是一種贏得勝利的手段，能使人在獲得優勢之後再發動攻擊，可視為積極的。¹⁵⁰克勞塞維茨復將防禦分為連續的四個階層，他假設一個軍團奉命防守其作戰地區，則此軍團可採取四種方式：

第一、它可以當敵人一侵入其作戰地區時，就立即向其發動攻擊。

第二、它可以在接近邊界的地方佔領陣地，等到敵人出現並將要攻擊時，然後搶先攻擊。

第三、它可以等到，不僅是敵人已經完成攻擊部署決定攻擊，而且敵人已經開始攻擊。這個軍團將打一種真正的防禦性會戰，其中可採取攻勢行動。

第四、它可以向國家的內部撤退，然後再在那裡抵抗。此種撤退的目的，是想要減弱攻擊者，可坐待攻擊者自願停止前進，又或使攻擊者無力克服其終於將遭遇到的抵抗。¹⁵¹

就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而言，蔣中正說他節節後撤，但又不斷嘗試反攻，並不矛盾。這都是防禦戰的一環。對蔣來說，專守防禦從來不是選項，要能勝敵，就必須找機會反擊；他一直採取攻勢防禦，只是國軍受戰力限制，形成專守防禦。因此，蔣發動攻勢不是欲一舉勝敵，而是以戰術攻勢實施戰略防禦。開戰之初國軍的行動，在華北盧溝橋事變後立刻派兵北上，以及在淞滬主動進攻在上海租界的日軍，類似克勞塞維茨防禦第一階層；其後日軍不斷進攻，在各戰場類似第三階層；國軍作戰不利，節節抵抗後撤，類似第四階層（因為日軍駐紮於中國境內，故無第二階層）。就此而論，蔣的對日戰略，是一個連續性過

¹⁵⁰ 克勞塞維茨著，巴芮特（Paret Peter）、何華德（Howard Michael）英譯，鈕先鍾中譯，《戰爭論》（臺北：軍事譯粹社，1980），中冊，頁 557-558、577。以下徵引，省略譯者。

¹⁵¹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冊，頁 595-596。

程，他的訓詞雖然淡化了前面幾個階層，而強調最後一個階層，但也不僅僅是一套遁詞。

本文不是說蔣中正或國軍高層就是受克勞塞維茨影響，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有助於理解當時國軍的戰略戰術。此外，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於德國軍事思想具代表性，深受日德軍事思想影響的國軍，或多或少受其潛移默化。其實國軍負責軍事作戰的軍令部次長劉斐便明白表示，國軍的抗戰守勢戰法，就是採用克勞塞維茨所說的防禦第四階層。¹⁵²1950 年代蔣中正下令重新翻譯《戰爭論》，親自審閱批註，在克勞塞維茨闡述第四階層防禦方法的段落之上，批註：「此節即是空間換時間之原理。」¹⁵³可見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與國軍持久消耗戰思想，確有相通之處。至於，蔣中正與其他國軍高層的軍事思想是否一致？事實上，蔣中正早年留日所學及所自學之現代兵書，便是這一套日德軍事思想。而抗戰期間國軍中央軍事機構人員主體，多為中國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或中國保定軍校畢業，該等軍事學校，亦皆傳授此套思想。¹⁵⁴推論蔣與國軍高層其他將領在思想上有相通之處，應屬合理。

回到 1939 年的四次反攻，即便沒有那麼多短期政略考量，依前述軍事思想的邏輯，國軍也會發動反攻。武漢會戰以後，蔣中正等國軍高層以為，與過去戰局相較，國軍已經撤到平漢鐵路以西的大後方，有著地形的防禦優勢，而日軍已到攻勢頂點，兩軍的力量應該要開始翻轉，所以加強了反攻的力度。¹⁵⁵於是，從整個抗戰八年來觀察，1939 年的四次反攻是最多的，也可說是最罕見的。該年蔣中正制定《抗戰手本》，內容多次強調攻擊精神，力陳「作戰須常立於主動之地位，為戰術上千古不易之原則」；「軍隊有奮發充溢之攻擊精神，為必勝之要素」。他要求各級官長誘導全體士兵「振作其攻擊精神」。¹⁵⁶

¹⁵² 劉為章，《敵我戰略戰術之研究》（重慶：勝利出版社，1942），頁 35。劉斐，字為章。

¹⁵³ 克勞塞維茨原著，張柏亭主譯，《戰爭論》（臺北：武學書局，1956），篇 6（上），頁 77。

¹⁵⁴ 蘇聖雄，《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頁 351-357。

¹⁵⁵ 劉為章，《敵我戰略戰術之研究》，頁 3-4；蔣中正，〈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1938 年 11 月 25 日），收入《蔣總集》，卷 15，頁 487-489。

¹⁵⁶ 蔣中正，《抗戰手本》（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9），頁 33-34。

蔣將這樣的思想灌輸給全國軍隊，而國軍戰時軍事教育，承襲日德傳統，也是這樣教育軍官。白崇禧是中日戰爭時負責全國軍事教育的軍訓部長，他回憶國軍軍事教育「還是注重攻擊的教育」，因為攻擊在精神上是主動，防禦是被動，防禦須處處採守勢，備多力分。就目的而言，攻擊就是將敵人的力量殲滅達成任務；就技術上而言，從追擊到殲滅敵人為止，一切戰術都包括在攻擊教育範圍以內。¹⁵⁷

綜而言之，國軍軍事思想承襲日德，特色在重視「重點之形成」，主張「攻擊致勝論」，指揮官應大膽、勇敢、企圖心旺盛，只要可能，就應實施攻擊、攻擊再攻擊，捕捉戰機，制敵機先。¹⁵⁸此一思想在中日戰爭初期的實踐，便是戰略守勢、戰術攻勢的攻勢防禦。盧溝橋事件以來，國軍行守勢作戰，並未忽視攻勢的重要，1939 年四次反攻是軍事思想上的延續，不是 1938 年底南嶽軍事會議後的新戰法。¹⁵⁹

南嶽軍事會議後國軍加強主動進攻力度，1939 年達到高峰，但是冬季攻勢以後，頻率大幅下降。是否冬季攻勢讓蔣中正積極轉消極？樂觀轉悲觀？或是蔣透過冬季攻勢，發現到國軍問題重重，無法再發動攻勢？

國軍確實於冬季攻勢顯現諸多問題。負責軍事作戰的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在冬季攻勢僅發動一個月後，於日記提到「第一、二、三、八、九戰區皆由積極進攻漸取消極攻戰矣」。¹⁶⁰再過半個月，日記提到除了第五戰區和桂南，冬季攻勢幾乎停止，毫無成績。¹⁶¹再過一週，徐永昌記下各地報上來的戰績，難說豐碩。¹⁶²或是戰事剛結束，各戰區成果尚未統計完整。實際上日軍受到一定

¹⁵⁷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紀錄，郭廷以校閱，《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下冊，頁 509。

¹⁵⁸ 楊學房、朱秉一主編，《陸軍大學沿革史》（臺北：三軍大學，1990），頁 116-117、239。

¹⁵⁹ 南嶽軍事會議另一個強調的游擊戰，也不是該會議才提出，先前已經提倡。限於論述邏輯與篇幅，本文暫不展開討論。

¹⁶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下略），《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冊 5，1939 年 12 月 29 日，頁 254。

¹⁶¹ 《徐永昌日記》，冊 5，1940 年 1 月 13 日，頁 263。

¹⁶² 「俘敵二九五、馬一一四一、步槍二五〇六、機槍一九三、砲四二、裝甲車三九〇及其他。」《徐永昌日記》，冊 5，1940 年 1 月 22 日，頁 269。

打擊。面對第五戰區的第五十八聯隊（屬第十三師團），所屬三個大隊，兩名大隊長戰死，一名受傷，全隊損害極大。¹⁶³國軍主要目標日軍第十一軍的內部報告自承，死傷合計約 8 千人，為成軍以來前所未見之犧牲。¹⁶⁴但是，國軍發動如此規模的反攻，給該軍的傷亡不能說非常高，這樣的傷亡數字，只跟範圍相對小的台兒莊之役傷亡差不多。¹⁶⁵

蔣中正對冬季攻勢及桂南會戰結果很不滿意，作戰結束以後召開柳州軍事會議，檢討戰績，批評國軍缺乏攻擊精神，要求改進。¹⁶⁶他在會議閉幕式上，發表對冬季攻勢的總評，對多數戰區的表現極不滿意，僅對助攻的第一、第八戰區表示肯定。¹⁶⁷蘇聯總顧問福爾根檢討第三戰區冬季攻勢經過，亦批評部分戰區司令長官和集團軍總司令過於畏懼敵人，不能以其積極堅決之行動爭取主動，以「謹慎」之理論以為掩護。¹⁶⁸徐永昌在其日記，持續有國軍缺陷的記載，如過度的避實擊虛、部隊不協同、一打即潰。¹⁶⁹

是以，冬季攻勢之後，國軍高層的確發現在官兵訓練、武器裝備、戰略戰術各方面問題重重，整訓未符期待，且消耗資源過高，予敵損失並不合算。那麼，是否蔣中正因此對戰局樂觀轉悲觀？對反攻積極轉消極？

首先，蔣中正可說是一「希望性最大之人」，¹⁷⁰雖不斷遭遇困挫，仍未動搖決心，往樂觀方向看待。¹⁷¹很難說 1939 年底冬季攻勢之前，他對國軍比較

¹⁶³ 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聯隊史編纂委員會編，《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聯隊史》（東京：步五八會本部，1982），頁 262。

¹⁶⁴ 〈第三、戰果〉，《冬季作戰・作戰經過の概要・昭和 14 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3031692500。

¹⁶⁵ 日軍台兒莊傷亡，歷來統計頗有落差，有說約 5,100 人，亦有說約 12,000 人。數據不同，部分是因為所統計的時間範圍不同。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頁 171。

¹⁶⁶ 蔣中正，〈柳州軍事會議訓詞（一）〉（1940 年 2 月 24 日），收入《蔣總集》，卷 17，頁 52、63。

¹⁶⁷ 蔣中正，〈柳州軍事會議閉幕訓詞〉（1940 年 2 月 25 日），收入《蔣總集》，卷 17，頁 85-86。

¹⁶⁸ 「總顧問福爾根對於第三戰區冬季攻勢作戰經過之報告」（1940 年 1 月 22 日），〈全面抗戰（十八）〉，《蔣檔》，典藏號 002-080103-00051-006。

¹⁶⁹ 《徐永昌日記》，冊 5，1940 年 3 月 6 日、4 月 11 日，頁 290、307。

¹⁷⁰ 此為徐永昌的評語。《徐永昌日記》，冊 4，1938 年 10 月 14 日，頁 400。

¹⁷¹ 張發奎口述，夏連蔭訪談記錄，胡志偉譯註，《張發奎口述自傳》，頁 362、550；蘇聖雄，〈「轉危為安」：武漢會戰期間蔣中正心態之考察〉，《抗戰史料研究》，2012 年第 1 輯，頁 179-190。

樂觀，而此後就比較悲觀。同樣地，在國府打滾多年，從國軍基層上升到最高統帥，蔣早知國軍問題重重。開戰以來，他不斷要求反攻，同時不斷看到各級指揮官無法發動進攻，或是戰績未符期待。冬季攻勢前的幾次訓詞，已多次表示國軍缺乏進攻精神、協同不佳、訓練不良等缺點（詳前）。不用等到冬季攻勢，蔣才知道國軍發動進攻的種種困難。冬季攻勢國軍傷亡雖大，但相比其他會戰，難說多到給蔣深重打擊，促其樂觀轉悲觀。¹⁷²當然，冬季攻勢可能加深他對國軍無法發動攻勢的印象，刺激他對發動反攻趨於保守，不過冬季攻勢之後，蔣仍要求他的部屬發揮進攻精神。¹⁷³在 1940 年底的日記，提到「半年以內，必須將我軍整訓完畢，則半年以後，無論對敵對匪，皆可主動自如也」，¹⁷⁴即當前採取守勢，是待整訓完後再取攻勢。之後，國軍的確曾發起大規模反攻，指向四川門戶的宜昌，造成日軍相當傷亡。¹⁷⁵自冬季攻勢一直到戰爭結束，國軍仍不斷研擬反攻計畫，如 1941 年 5 月〈國軍攻勢作戰計畫〉、1942 年 5 月〈國軍秋季攻勢作戰計畫〉、1944 年 3 月〈收復宜沙會師武漢作戰計畫〉、1945 年 2 月〈中國陸軍作戰計畫大綱〉。¹⁷⁶

那麼，冬季攻勢以後，國軍正規攻勢的確較 1939 年大幅減少，其故為何？從蔣中正的日記，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解釋。他說西南國際運輸已絕，西北路線俄國接濟無望，以後武器補充日難，「故對倭抗戰再不能取陸續攻勢，惟有積極將現有主力部隊整補充實，以待國際之變化，培養中央之實力，無論對內、

¹⁷² 據國軍主要交手的日軍第十一軍統計，國軍遺棄屍體概數，冬季攻勢 51,000 具，而南昌會戰 24,100 具，第一次長沙會戰 44,100 具，各地掃蕩作戰 63,800 具，武漢會戰更高達 143,500 具。〈第 11 軍作戰經過的概要並に所見〉，《第 11 軍軍狀報告・昭和 13 年 7 月中～15 年 3 月 8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1112072000。

¹⁷³ 如上文提到的柳州軍事會議訓詞。蔣對攻擊的訓令，可參見〈重慶軍戰法の參考〉（昭和 13 年 12 月-18 年 2 月 11 日），頁 7-9，《支那一支那事変全般—20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1110495600、C11110495700。

¹⁷⁴ 〈蔣中正日記〉，1940 年「民國二十九年大事表」，10 月 12 日「中共與蘇俄最近形勢之變化之研究」。

¹⁷⁵ 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頁 126-146；海福三千雄，《步兵第四百聯隊小史：大陸転戦譜》（東京：原書房，1971），頁 60-70。

¹⁷⁶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一），頁 681-686、694-701、712-714、728-730。

對外雖各處接濟斷絕，亦有自力可恃而無恐也」。¹⁷⁷又說：「以後反攻，非待各戰區整訓完妥，而有充分把握時，決不宜輕舉嘗試，否則如反攻無效，不惟後繼補充為難，而敵且攻川無忌矣。」¹⁷⁸亦即，物資輸入斷絕，使得國軍資源缺乏，難以再發動攻勢，再加上前述國軍諸多缺陷，顯示整訓未達成效，反攻對國軍傷害更大，因此傾向保守，不輕易嘗試發動。物資斷絕的影響尤其巨大，英國外交官觀察，日本對中國多數對內對外路線的封鎖，剝奪中國大批部隊幾乎全部的進攻力量，使其減少到無能為力的境地。¹⁷⁹

上述背景，同時導致蔣中正或國軍高層對日戰術的轉變。冬季攻勢後國軍的戰略戰術，仍舊延續開戰以來至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的轉守為攻，但這個攻從主動進攻，轉為敵來攻再反攻，也就是從「攻勢防禦」，轉變為「後退決戰」。¹⁸⁰這種轉變軍事上的動機，可以再藉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予以理解。他認為在敵我力量還沒逆轉之前，拖延這樣看起來消極的防禦方式完全必要，這將使防禦者累積優勢，而在拖延過程，防禦者「絕無減弱抵抗行動的意圖」，仍將採取積極的行動，可以是大會戰，也可以是較小兵力的數個戰鬥。整個過程或許顯得消極，實際上有著積極目的，等待雙方力量的逆轉。¹⁸¹就此脈絡而言，冬季攻勢後蔣中正拖延大規模反攻，確實顯得消極，同時也可說有著積極目的，即等待雙方力量的逆轉，過程並持續以游擊戰或小規模反攻等其他方式，給敵軍壓力。於是，如前所述，蔣在這個過程不是沒有反攻，他從未放棄攻勢，在日記中記到：「以後作戰方針應養精蓄粹，非整訓完成，不輕決戰，但各戰區不時以一師以下之兵力乘機出擊，不斷打擊敵軍為主。」¹⁸²這樣的乘機出擊，除了大範圍小兵力的游擊戰，從先攻敵軍據點，轉為待敵來攻再反擊，即「待敵來攻，縱深抵禦而反擊之，則勝利在我者多，若我先攻其據點，而求其悖勝，

¹⁷⁷ 〈蔣中正日記〉，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大事表」，9月24日。

¹⁷⁸ 〈蔣中正日記〉，1940年8月26日。

¹⁷⁹ Sir A. Clark to Mr. Eden, Chungking, January 20, 1941, in Robert L. Jarman,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 vol. 6, p. 603.

¹⁸⁰ 楊學房、朱秉一主編，《陸軍大學沿革史》，頁35。

¹⁸¹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冊，頁598-601。

¹⁸² 〈蔣中正日記〉，1940年3月9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

則必失敗也」。¹⁸³他將這個想法於軍事會議上訓示，要求遵行：「所謂主動，並不是說取攻勢才有主動，而取守勢被攻就不能主動了。須知我們取守勢被攻擊的時候，也要爭取主動的地位，然後才可以制勝。」¹⁸⁴

如此待敵來攻再反攻決戰，可說是相對適應兩軍戰力對比的國軍戰術。國軍因火力、訓練不足，進攻日軍據點難以取勝，但若是敵軍輕進，拉長補給線，國軍得以把握機會，趁機形成包圍圈予敵側擊。1938 年 3 月的台兒莊之役，便是這種戰法的經典戰例。¹⁸⁵1940 年中，蔣中正給此一戰術新的名字：「磁鐵戰。」¹⁸⁶在 1941 年底的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他解說這個戰術，就是國軍在會戰或戰鬥沉著堅定，延長時間，爭取時間，造成有利時機，「一俟決戰時期成熟到來，然後傾注我們的主力與預備隊，來圍殲當面的敵人」。¹⁸⁷蔣此一訓詞，無疑誇大了該戰術的效用，但確實呈現國軍戰略戰術的變遷。開戰以來，尤其是 1939 年四次反攻的經驗教訓，使蔣更深刻地認知國軍主動進攻難以討到便宜，敵來攻、國軍再反擊，較易佔得上風。

對手方日軍也察覺到了國軍戰略戰術的轉換。根據日軍的研究，國軍戰法的變遷，在武漢陷落前是「決戰防禦」，武漢會戰到冬季攻勢這段時間是「全面總反攻（準決戰）」，此後是退避戰法，空室清野，並配合內外呼應據點攻略、進攻防止防禦戰法等，¹⁸⁸可見國軍戰略戰術於武漢會戰到冬季攻勢間發生轉換，而這個轉換的樞紐，便是 1939 年的四次反攻。

不論是敵來攻國軍再反攻，或是國軍在日軍來攻前主動發動進攻，國軍都曾實施，令人不解的是，何以外籍顧問仍傾向批評國軍消極，不喜發動攻勢？

¹⁸³ 〈蔣中正日記〉，1940 年 9 月 8 日。

¹⁸⁴ 蔣中正，〈宣讀「柳州軍事會議訓詞第一冊」後講解〉（1941 年 10 月 18 日），收入《蔣總集》，卷 18，頁 384。

¹⁸⁵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頁 151-169。

¹⁸⁶ 蔣中正，〈最近國際大勢與中日戰局〉（1940 年 6 月 17 日），收入《蔣總集》，卷 17，頁 364。

¹⁸⁷ 蔣中正，〈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開會訓詞（三）〉（1941 年 10 月 21 日），收入《蔣總集》，卷 18，頁 359。

¹⁸⁸ 〈重慶軍戰法の参考〉（昭和 13 年 12 月-18 年 2 月 11 日），頁 1，《支那一支那事変全般—20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JACAR，檔號 C11110495300。

這可以區分是統帥蔣中正個人不想發動攻勢，還是廣大的國軍難以發動攻勢。如前所述，國軍因為戰力低落，確實難以發動攻勢，武器、運輸、訓練、軍系等問題，都使得發動攻勢對個別部隊危險太大，指揮官或因此傾向保守。至於蔣中正個人，則始終認為攻勢防禦的重要，於多次軍事會議要求將領發揮攻擊精神。因此，外籍顧問雖不會刻意區分批評對象，其批評實際上是針對各級將領。

冬季攻勢之後對外運輸中斷，國軍各種問題更為凸顯，連蔣中正都傾向不主動發動攻勢，改變戰術，敵來攻再反攻。這個時候，外籍軍事顧問批評國軍不主動出擊，對象不僅為各部隊將領，實際上包括蔣中正本人。1940 年抵達中國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崔可夫就觀察到這個轉變，指出蔣「徬徨於十字路口」，「他想都不想對日本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蔣介石及其將領對真正抗日並不感興趣。他們知道日本在做大戰準備，但不願意以自己的積極抗日行動來妨礙日本」。¹⁸⁹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司令，批評蔣中正最為激烈。我們可以從他們爭執內容，看出戰術的歧異。1942 年 3 月第一次緬甸作戰期間，蔣與史迪威討論戰術。蔣表示曼德勒是危險的臨界點，如果英國人逃跑，日本人將奪取曼德勒並消滅我們。史迪威主張進攻。蔣提醒史迪威必須了解，一個中國軍只相當於一個日本師，我們沒有兵力，我們並不知道對方的實力。史迪威接著主張，在他們集結起來之前就動手。蔣答覆我們必須等待，如果他們不再增援，我們才能進攻。史迪威認為，如果他們增援，那時就太強大，而我們就只能防禦。蔣強調防禦方法應採用效果良好的老方法——縱深防禦，以師為單位，每個師相距 50 英里，在我們穩固了我們的基地、一切都準備好了後，如果日本人還不採取行動，那我們就採取行動。¹⁹⁰考察兩人對話，可知蔣中正建議史迪威採行後退決戰戰

¹⁸⁹ 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頁 74、100。

¹⁹⁰ Theodore H. White, arr. and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8), pp. 53-54.

法。論者或指出，史迪威在美軍事教育，傾向主動進攻，而中國的軍事文化，則傾向以靜制動。¹⁹¹依本文所論，蔣中正或國軍高層並非僅受中國軍事傳統的影響，日德軍事思想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蔣實際上也認為應該進攻，但經驗教訓告訴他，這不是最適當的抗日戰術。1939 年的四次反攻證明，國軍主動出擊，始終佔不到便宜，長期擔任國軍統帥的蔣中正親歷戰事，不斷檢討，對兩軍力量對比及抗日戰術的判斷，已較外籍軍事顧問更為精準。

五、結 論

武漢會戰後，國軍規劃輪流抽調部隊整訓，全部整訓完畢，即開始大規模反攻。實際上尚未等到整訓全部完成，國軍陸續發動攻勢，計有四月攻勢（春季攻勢）、七月攻勢（夏季攻勢）、九月攻勢（秋季攻勢）、冬季攻勢。歷次反攻，國軍自認達到持久消耗日軍的目標，實際上日軍雖確實受到一定壓力，但沒有國軍想像的嚴重，這些攻勢反使日軍發起再反擊，引致會戰，打擊國軍主力，削減國軍戰力，或斷國軍交通線，如隨棗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桂南會戰。

國軍為何發動四次反攻？論者多聚焦討論最後一次的冬季攻勢，歷來概有兩類論述，一為政略考量；一為對戰局樂觀，欲自力勝敵。關於政略考量，蔣中正無疑對此極其重視，欲獲得國際援助，或期待世界大爆發以減輕中國戰場的壓力。但是，考察 1939 年中國對外關係，爭取經濟援助確實在進行，反攻可能為此而發，展現犧牲，博得同情，但難說為其主因，而且與歐戰爆發或汪兆銘投向日本沒有直接關係。關於自力勝敵，蔣中正或整個國軍高層，確實有藉由加強反攻，促成日本崩潰的設想，這應是加強反攻力度的主要原因之一。論者或批評蔣中正有速勝論傾向，沒有認清中日國力差距、沒有認知到戰爭會打得很久。事實上，日本經濟政治的可能崩潰，有著大量情報的支持，蘇聯顧

¹⁹¹ 相關說法的回顧與檢討，參見 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pp. 8-12; Hans van de Ven, ed.,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0), pp. 2-3.

問或列強情報也如此判斷，不是蔣個人的空想。並且，規劃自力反攻的同時，蔣對內有長期規劃，對外並未放棄國際解決。他的想法屬多層次，一方面欲自力勝敵，一方面不抱過度期待，仍有長期準備並爭取國際支援或干涉。

除了政略或對日本崩潰的期待，蔣中正發動反攻有著軍事思想的深厚背景。國軍軍事思想受日德很深的影響，強調攻勢、決戰、形成重點。傳統論述說武漢會戰前是守勢時期，實際上國軍受日德軍事思想影響，不斷嘗試主動進攻，戰略上取守勢，戰術上取攻勢，即攻勢防禦，認為專守防禦之非計。開戰之初，派兵北上華北戰場，準備反攻北平和日軍會戰，在淞滬戰場則先發制敵。蔣不斷要求其將士要有攻擊精神，雖然幾場會戰看起來是專守防禦，實際上他從未忽視攻勢的重要。武漢會戰以後，蔣判斷日軍已到攻勢頂點，遂延續攻勢防禦戰術，在 1939 年發動四次反攻。傳統論述以武漢會戰後為界區分一、二期，前者守勢，後者持久反攻，史實非如所論，國軍戰略戰術是延續與疊加，不是守勢攻勢的轉變。也就是說，就軍事思想脈絡而言，即便沒有短期政略考量，國軍都會發動反攻，這應是 1939 年發動四次反攻的根本原因。

冬季攻勢以後，國軍的反攻顯著減少，論者或分析，這是因為蔣中正發現國軍沒有力量反攻，並且國際交通路線中斷，缺乏戰爭資源，於是樂觀轉悲觀，積極轉消極。大體而言，所論真確，冬季攻勢以後，國軍遭遇物資不足、地方軍系或中共坐大等問題，這些都促使蔣重新反思反攻作戰的實施。然而，難說蔣之前就比較樂觀，後面就比較悲觀，他性格極富信心懷抱希望；至於國軍缺乏反攻能力，不用等到冬季攻勢，蔣早就知道，冬季攻勢只能說是加強這個印象。

或許仍可由軍事思想的脈絡，理解國軍攻勢減少的原因。經過 1939 年的幾次反攻，蔣中正充分認知防禦戰略的戰術，不必要主動發動攻勢，可以等到敵軍來攻，國軍再反攻。這在台兒莊之役或第一次長沙會戰等作戰，證明是比較適應國軍戰力的戰術。因此，國軍在冬季攻勢之後，不是沒有反攻行動，蔣仍耳提面命將領要有攻擊精神，軍令部也仍然擬定反攻作戰計畫，只是反攻方

式變了，從「攻勢防禦」轉為「後退決戰」，此一轉變在後面的幾次會戰，清晰可見。

在華外籍顧問，往往認為國軍缺乏進攻意願。這不是冬季攻勢後美軍顧問的印象而已，冬季攻勢前蘇聯顧問也有如此批評。所以難說冬季攻勢後，國軍作戰意願才變得消極。但是，冬季攻勢前外籍顧問的批評，實際上不是針對最高統帥蔣中正——因為他也認為應主動出擊——而是針對各級指揮官考慮戰力不足或保存實力而發。此後外籍顧問的批評，因為蔣戰略戰術的轉變，故不僅是批評國軍指揮官，並及於蔣個人。史迪威與蔣的爭執，關鍵在此，不是蔣不反攻，而是雙方對於反攻戰術有不同見解。

進一步言之，武漢會戰以後，中日兩軍在平漢線僵持，國軍具地形優勢，而日軍到達攻勢頂點，1939 年國軍的四次反攻，不但是先前戰略戰術的延續，也可說是國軍重新摸索抗戰戰略戰術。與其說冬季攻勢是國軍積極、消極的分水嶺，不如說四次反攻是國軍軍事思想的轉變期。這樣的轉變，對後面的軍事作戰，有深切的影響，甚至延續到國共內戰。國共內戰結束後，國軍的檢討指出：「抗戰時期軍事設施上之優點，自我毀滅，而對抗日之戰術思想，依然沿用於戡亂時期，此乃經驗教訓中最值得檢討之大事。」¹⁹²亦即，國軍將領習慣抗戰時期的戰術，無法適應對共軍的作戰。而這個戰術思想的延續與轉變，就在本文討論的這段期間。

至於開戰以來國軍的攻勢防禦，對於中日戰爭全局有何影響？其影響可謂深遠。首先，它藉投入中央軍帶動地方軍，促使中國軍隊凝聚抗敵。其次，透過地區性決戰，將戰火延燒至大城市，擴大宣傳並激起民族主義，幫助政府動員人力物力。同時，這也使國際看到中國政府對戰爭的執著，促成國際同情與支持。再者，日軍為擊退國軍，不斷擴大戰面，無法穩定佔領奪取的地域，消

¹⁹² 國防部編，《剿匪重要戰役之追述與檢討》（臺北：國防部，1951），集 4，頁 131。相關檢討另可參見：國防部編，《剿匪重要戰役之追述與檢討》，集 4，頁 80、127；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冊 15 總檢討，頁 114；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冊 9 總檢討，頁 152。

耗戰爭資源，迫使其向東南亞發展，成為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遠因之一。然而，這種戰略戰術也帶來負面結果，包括大幅消耗國軍戰力，影響政府的國家治理與對外談判籌碼；中央軍在部分會戰中成為日軍主要目標，消耗過大，影響中央與地方力量的平衡；為整補殘破國軍，嚴重消耗國家資源，加劇對民間的攫取，成為反政府言論與行動的溫床等等。當然，上述正負面結果，不是攻勢防禦單一因素促成，但戰略戰術引領戰爭全局，其作用不容輕忽。¹⁹³要之，論者分析蔣中正或國軍高層的對日抗戰，往往著重於政略層面，相對忽視純軍事的探討。本文以 1939 年國軍的四次反攻為例說明，軍事思想的分析能夠補充當前歷史解釋，豐富歷史圖像。

¹⁹³ 蘇聖雄，《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頁 454-455。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國史館藏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

-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七年（二）〉，典藏號 002-080200-00282-015。
-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八十三）〉，典藏號 002-080200-00510-047、002-080200-00510-061。
-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一）〉，典藏號 002-080200-00518-023、002-080200-00518-025、002-080200-00518-055。
-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九十四）〉，典藏號 002-080200-00521-068、002-080200-00521-112、002-080200-00521-113。
- 〈八年血債（二十八）〉，典藏號 002-090200-00052-066。
- 〈全面抗戰（一）〉，典藏號 002-080103-00034-008。
- 〈全面抗戰（十八）〉，典藏號 002-080103-00051-006。
- 〈革命文獻—抗戰方略：重要指示〉，典藏號 002-020300-00004-045、002-020300-00004-046、002-020300-00004-047、002-020300-00004-048。
- 〈革命文獻—第二期第一階段作戰經過概述〉，典藏號 002-020300-00012-001。
- 〈革命文獻—對美外交：一般交涉（一）〉，典藏號 002-020300-00028-022、002-020300-00028-023。
- 〈領袖指示補編（十二）〉，典藏號 002-090106-00012-264。
- 〈敵偽組織（二）〉，典藏號 002-080103-00010-012。
- 〈籌筆—抗戰時期（三十）〉，典藏號 002-010300-00030-013、002-010300-00030-035、002-010300-00030-036。

《陳誠副總統文物》

- 〈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經過（一）〉，典藏號 008-010702-00039-003。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長沙抗日會戰案（一次）〉，檔號 B5018230601/0028/543.6/7173B。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案

《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

- 〈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 年 4 月），檔號七八七-13295。
- 〈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 年 7 月），檔號七八七-13304。

- 〈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年8月），檔號七八七-13305。
〈天水行營機密作戰日誌〉（1939年9月），檔號七八七-13306。
〈第二戰區司令官司令部作戰日記〉（1939年9月），檔號七八七-13397。
〈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陣中日記〉（1939年9月），檔號七八七-13691。
〈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陣中日記〉（1939年9月），檔號七八七-13698。
〈敵經濟能力判斷表〉（1938年3月13日），檔號七八七-5240。
〈抗戰以來我敵傷亡統計表〉（1945年6月），檔號七八七-3163。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

《支那一支那事变全般—206》

- 〈重慶軍戦法の参考〉（昭和13年12月-18年2月11日），檔號 C11110495300、
C11110495600、C11110495700。

《支那事变教訓・昭和13年10月～14年9月》

- 〈9月攻勢の觀察〉，檔號 C11110697400。

《第11軍軍狀報告・昭和13年7月中～15年3月8日》

- 〈第11軍綜合戦果一覽表（自昭和13年7月至昭和15年2月）〉（昭和15年3月8日），
檔號 C11112071800、

- 〈第11軍作戰經過の概要並に所見〉，檔號 C11112072000。

《第11軍作戰經過の概要並に所見・昭和13年》

- 〈襄東会戦〉，檔號 C11112058000。

- 〈贛湘会戦〉，檔號 C11112058100。

《冬季作戰・作戰經過の概要・昭和14年》

- 〈第三、戦果〉，檔號 C13031692500。

《陸支受大日記（密）第59号・昭和14年自9月13日至9月18日》

- 〈「蒋介石8月26日付9月攻勢に関する視察」送付の件〉，檔號 C04121361700。

二、史料彙編、文集、報刊

《大公報》（天津），193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何應欽編，《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冊，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48。

步兵第四十五聯隊史編纂委員會編，《步兵第四十五聯隊史》，東京：步兵第四十五聯隊史編纂委員會，1981。

苟吉堂編，《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抗戰記實》，出版地不詳：中國陸軍第三方面軍，1947。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武漢會戰期間國軍作戰之經驗教訓》，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1940。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編，《徐州會戰期間國軍作戰經驗》，出版地不詳：軍事委員會軍令部，1940。

海福三千雄，《步兵第百四聯隊小史：大陸戰譜》，東京：原書房，1971。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15、17-18，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聯隊史編纂委員會編，《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聯隊史》，東京：步五八会本部，1982。

蘇聖雄主編，《諜報戰：軍統局特務工作總報告（193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Jarman, Robert L.,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 Vol. 6.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2001.

三、日記

〈蔣中正日記〉，1938-1940，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張發奎日記〉，1939，哥倫比亞大學珍本與手稿圖書館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冊 4、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何成濬著，沈雲龍校註，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何成濬將軍戰時日記》，上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

伊藤隆、照沼康孝解說，《陸軍：畑俊六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83。

White, Theodore H., arr. and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Willaim Sloane Associates, 1948.

四、自傳、回憶錄、訪談錄

卡利亞金著，賴銘傳譯，《沿著陌生的道路：一位蘇聯駐中國軍事顧問的筆記（1938-1939 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

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周黎揚，〈抗日戰爭期間蘇聯軍事顧問〉，《百年潮》，2005 年第 8 期，頁 26-27。

崔可夫著，萬成才譯，《在華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

張發奎口述，夏連蔭訪談記錄，胡志偉譯註，《張發奎口述自傳》，臺北：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7。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紀錄，郭廷以校閱，《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稻葉正夫編，《岡村寧次大將資料・戰場回想篇》，東京：原書房，1970。

五、專著

三軍大學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五部——戡亂》，冊9總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

井本熊男，《支那事变作戰日誌》，東京：芙蓉書房，1998。

王正華，《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87。

何應欽編著，《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克勞塞維茨原著，張柏亭主譯，《戰爭論》，篇6（上），臺北：武學書局，1956。

克勞塞維茨著，巴芮特（Paret Peter）、何華德（Howard Michael）英譯，鈕先鍾中譯，《戰爭論》，中冊，臺北：軍事譯粹社，1980。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戰〈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5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陸海軍年表（付：兵語・用語の解説）》，東京：朝雲新聞社，1980。

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松元崇、庄司潤一郎、川島眞，《決定版・日中戦争》，東京：新潮社，2018。

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8。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

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廿八年冬季攻勢（一）（八）》，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各地游擊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南昌會戰（一）（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桂南會戰（一）（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第一次長沙會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隨棗會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四）》，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冊15總檢討，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國防部編，《剿匪重要戰役之追述與檢討》，集4，臺北：國防部，1951。

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曹劍浪，《國民黨軍簡史》，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修訂版）》，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二）：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合流 1938.11-1945.08》，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2。
- 陳誠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南京：國防部參謀本部，1946。
- 戰略研究学会編集，片岡徹也、福川秀樹編著，《戰略・戰術用語事典》，東京：芙蓉書房，2003。
- 楊學房、朱秉一主編，《陸軍大學沿革史》，臺北：三軍大學，1990。
- 榮維木等著，《戰時軍事》，收入步平、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卷 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 趙曾儔等編，《抗戰紀實》，冊 2，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 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 1937-1945》，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3。
- 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 1937-1941》，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 劉爲章，《敵我戰略戰術之研究》，重慶：勝利出版社，1942。
- 蔣中正，《抗戰手本》，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39。
- 蔣永敬，《抗戰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 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上卷，東京：日本評論社，1987。
- 蘇聖雄，《戰爭、制度與思想：近代中國參謀本部的興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3。
-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2018。
- 龔古今、唐培吉主編，王沛、楊衛和編寫，《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上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 Carlson, Evans Fordyce. *The Chinese Army: 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Dorn, Frank.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4.
- Eastman, Lloyd E.,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and Lyman P.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Tuchman, Barbara W.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 Van de Ven, Hans, ed.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0.
- Van de Ven, Hans.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六、論文及專文

方山，〈國民黨戰場一九三九年冬季攻勢簡論〉，《軍事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頁145-153、166。

毛澤東，〈論持久戰〉，《解放》，期43-44合刊，1938年7月，頁2-41。

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收入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1937年至1945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50-101。

李作民，〈評1939年冬季攻勢兼論國民黨抗日政策的轉折〉，《民國檔案》，1995年第1期，頁93-99。

傅應川，〈抗日戰爭的戰略思想及其發展〉，收入黃炳麟、王建朗主編，《兩岸共研抗戰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2023，頁99-112。

雒春普，〈閻錫山與第二戰區的「冬季攻勢」〉，《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頁89-97。

齊錫生，〈抗戰中的軍事〉，收入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學術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3-23。

劉鳳翰，〈論國軍與抗戰〉，《抗日戰史論集——紀念抗戰五十周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131-190。

蘇聖雄，〈「轉危為安」：武漢會戰期間蔣中正心態之考察〉，《抗戰史料研究》，2012年第1輯，頁179-190。

蘇聖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期46，2015年12月，頁61-101。

蘇聖雄，〈空間換取時間？——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軍事布局（1935-1937）〉，《臺大歷史學報》，期66，2020年12月，頁97-151。

蘇聖雄，〈從軍方到學界：抗戰軍事史研究在臺灣〉，《抗日戰爭研究》，2020年第1期，頁141-157。

Th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Military Thought: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s Four Counteroffensives in 1939

Su Sheng-hsiu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ary Army (NRA), the entir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as well planned, with the strategy of exchanging space for time and of a protracted war of resistance; and in the second phase after the Battle of Wuhan, the NRA shifted towards the offensive to achieve victory. Contrary to this account, some commentator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NRA, have criticized it for its passive strategy and lack of will to attack, arguing that Chiang Kai-shek (1887–1975) looked to the West for help while maintaining large numbers of troops to defend against Mao Zedong's (1893–1976) Communist forces. The present article revisits these divergent views by examining the four counteroffensives of the NRA in 1939, only mentioned in passing by previous studies, to consider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said offensives.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are first reconstructed. Second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y the offensives were launc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trategy, analyzes statements over the so-called “quick victory theory,”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NRA's intelligence on strategy. Finally, military theory is adopted to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offensiv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NRA initiated the four counteroffensives due to political strategy and optimism in the war, but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was military ideology; that is, even if there were no political-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the NRA would have continued with the campaign in 1939.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ceived criticisms, the NRA had in fact adopted an offensive defense from the onset of the war, which reached its peak in 1939, but the ga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forces was too significant for it to be implemented. The counteroffensives of 1939 were not a new tactic but a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strategies, with this period also being a critical period of change in the military ideology of the NRA.

Keywords: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winter offensive, Chiang Kai-shek, *On War*, military thought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